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地理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水金九居民對於導入地質公園的地方認同感時空動態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Place Identity among Residents of
the Shuinandong-Jinguashi-Jiufen Region in Response to
Geopark Implementation



何亮軒

Ho , Liang Xuan

指導教授：王文誠 博士

Advisor : Wang, Wen Cheng, Ph.D.

中華民國 114 年 8 月

August 2025

謝 誌

本論文之完成，承蒙諸多師長、親友與同儕的支持與協助，謹此致上最誠摯的謝意。回望這三年在職進修的日子，於工作與學業之間來回切換，常在清晨與深夜中與資料為伴；一路走來，因為有各方的鼓勵與扶持，才得以堅持至此。

首先，衷心感謝指導教授王文誠老師。王老師在研究設計、資料分析與論文撰寫的每個關鍵階段，皆以耐心指導與不吝鼓勵相伴相隨；在我面臨瓶頸與疑慮之際，老師總能以清晰的脈絡與開闊的視野指引方向，使我得以穩步前行，受益良多。

同時，誠摯感謝口試委員李素馨老師與林俊全老師，撥冗審閱本文並提出精闢而具建設性的建議。兩位老師的指教使本論文之理論架構更為周延、論證更為嚴謹，在此深致謝忱。

感謝系上師長與朋友於研究期間提供的協助，以及同儕之間在課堂與討論中的交流與相互砥礪。亦感謝學習與研究過程中提供協助的每一位夥伴，你們的提醒、回饋與實務經驗分享，豐富了本研究的視野。

身為來自馬來西亞的學生，特別感謝遠方家人的理解與支持。跨國求學的思念與牽掛，因為你們的鼓勵而化為前進的力量。也感謝在臺期間一路陪伴的朋友們，在我分身乏術時伸出援手，讓我得以在繁忙生活中保持節奏與信心。

最後，感謝工作單位的主管與同事對於我兼顧學業的體諒與協助，包含彈性調整與實務建議，使我能在職場與研究之間取得平衡。以上未及一一致謝之處，亦謹此致以最深的感激。

摘要

水金九地區（九份、金瓜石、水湳洞）自 19 世紀末金礦開採興盛後，經歷礦業衰退而逐漸轉型為旅遊經濟。地質公園自 2004 年以來結合自然與文化資源的保育模式，對此區域的可行性引發關注。為理解地質公園導入對當地居民地方認同感的影響，本研究採用質性深度訪談法，針對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居民與地質公園推動者蒐集其對家鄉認同與地質公園的看法。理論上，地方認同感指向對居住地的情感依附與歸屬感。水金九居民的地方認同隨歷史與產業變遷而演變：在觀光興起期，不少年輕人返鄉經營茶坊、民宿、博物館等旅遊產業，重塑對家鄉的驕傲；進入地質公園時期後，透過地質與生態教育課程與志工導覽訓練，居民對家鄉自然與歷史價值有了全新認識，認同感再次凝聚。導入地質公園後，研究顯示地方經濟與教育活動都顯著活絡：新型旅遊體驗（如夜間生態導覽）延長了遊客停留時間，創造了導覽員與解說員等就業機會；觀光經濟帶動餐飲、民宿等業發展，許多返鄉青年以「在地創業」為榮。居民對家鄉的深厚情感連結與集體記憶是地方認同的核心。但是經濟因素也有可能是影響認同感的重要一環，是本研究主要探討的方向之一。地質公園的推動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區域整體的經濟富裕程度提升，連帶影響居民的生活品質。若居民實際感受到經濟狀況改善，則對家鄉的認同感容易增強；反之，若經濟效益未能普遍惠及居民，或改善不明顯，則地方認同感可能相對受到限制。因此，本研究認為地方認同感的形成與變化，除了情感依附與歷史記憶外，亦需考量經濟富裕程度所帶來的影響。

關鍵字：水金九地區、地質公園、地方認同感

Abstract

The Shuijinjiu area (Jiufen, Jinguashi, and Shuinandong)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from a flourishing gold-mining region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a tourism-oriented economy following the decline of the mining industry. Since 2004, the concept of a geopark integrating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regarding its feasibility in this region.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introducing the geopark on local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this study employed qualitative in-depth interviews, collecting perspectives from residents and geopark promoters across different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s regarding their hometown identity and perceptions of the geopark. Theoretically, place identity refers to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one's place of residence. Residents' place identity in the Shuijinjiu area evolved along with historical and industrial transitions: during the tourism boom, many young people returned to operate businesses such as tea houses, guesthouses, and museums, reshaping pride in their hometown. After the geopark era began, residents' recognition of the natural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ir hometown was further enhanced through geological and ecological education programs and volunteer guide training, thereby strengthening local identit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eopark significantly boosted lo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novative tourism experiences such as nighttime ecological tours prolonged visitor stays and created job opportunities for guides and interpreters. Tourism-driven economic growth stimulated development in food services, accommodations, and related industries, with many returning youths taking pride in local entrepreneurship. Residents' deep emotional connection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form the core of their place identity. However, economic factors could also play an essential role in shaping this identity, a key aspect explored in this study. The geopark's development enhanced overall regional prosperity, positively influencing residents' quality of life.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tend to strengthen residents' sense of place identity; conversely, if economic benefits are not widely or sufficiently experienced by residents, their place identity could be relatively constrained. Thus, this research highlights that place identity is shaped not only by emotional attachment and historical memories but also by economic prosperity.

Keywords: Shuinandong–Jinguashi–Jiufen region , Geopark , Place identity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2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4
第三節 研究內容	6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7
第一節 地方認同感之含義	7
第二節 地質公園的起源與發展背景	14
第三節 水金九地區歷史與礦業背景	2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6
第一節 研究流程與架構	36
第二節 質性研究之意涵	38
第三節 採用質性研究之理由	41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46
第一節 地方認同感	46
第二節 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地方認同感	52
第三節 建立在經濟地理的基礎下的認同	60
第四節 地質公園對地方認同感的影響	70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76
第一節 研究結論	76
第二節 研究限制	82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83
參考文獻	84

第一章 緒論

九份、金瓜石及水湳洞地區，因日治時期金礦的開採而蓬勃發展，隨著礦業衰退，城鎮逐漸沉寂，但保留下來的歷史風貌卻讓人得以一窺過去的繁華，也是現在九份地區觀光業發展蓬勃發展的重要養分。傳統街市、階梯式的小巷、燈籠高懸的茶樓，以及懷舊的建築風格，無不讓人聯想起《神隱少女》中的湯屋和神秘的異世界。在這樣的背景下，九份彷彿成為現實中的魔幻世界入口，為人們提供了無限的想像空間。從昔日礦業的輝煌到逐漸沒落，再到觀光業的興起，水金九地區的居民在不到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經歷了多樣且快速的時空變遷，也使得不同世代的居民對於這片土地產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與記憶。

綜觀九份與金瓜石的歷史與文化背景，這片山城不僅以其獨特的歷史故事吸引著遊客，還以其周邊的自然景觀展現出不同尋常的地質魅力。特別是金瓜石一帶所屬的地質公園，展現了台灣獨特的自然遺產，如壯麗的山巒、奇岩怪石，以及豐富的礦物資源，這些都是人類與大自然共存、互動的見證。地質公園不僅是生態保護的重要場域，也為遊客提供了體驗自然與文化相結合的契機(閻亞寧, 2014)。

這片山城的歷史與自然景觀交織，成為文化遺產與生態保護的重要象徵，吸引世人探索與珍視。本文將從九份、金瓜石及水湳洞的歷史發展、地理特徵，進行探討，試圖揭示水金九地區居民在不同時期的地方認同感及導入地質公園後的時空動態變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於 2004 年設立了全球地質公園網絡（Global Geoparks Network, GGN），目的是保護全球具有重要意義的地質景觀和自然遺跡，同時幫助當地社區實現永續經營發展。地質公園不僅要保護像特殊岩石、礦物、化石和山川地貌等自然資源，還強調與當地歷史文化的結合，讓自然景觀成為推動社區發展的重要力量（McKeever 等人, 2010）。

水金九地區位於臺灣新北市瑞芳區，與基隆山遙望。小鎮座落於山坡地上，因此形成了獨特的山坡和階梯式建築景觀。九份的歷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末，由於當地發現了豐富的金礦而興盛起來。1890 年代進入日治時期後，日本政府開始積極開發台灣的礦產資源，九份迅速崛起，成為金礦開採的重要地點之一。隨著礦業的繁榮，當地吸引了大量的礦工和他們的家庭，城鎮規模逐漸擴大，九份一度成為繁華的礦業城鎮(吳亞璇等人, 2015)。

在日治時期，九份的礦業發展也帶動了基礎設施的建設，鐵路、住宅、學校等相繼建成。這時期的建築風格和礦業文化至今依然保留，成為今日九份歷史文化遺產的重要部分。然而，隨著二戰的結束及金礦資源的逐漸枯竭，九份的礦業於 1950 年代開始衰退，當地經濟逐漸陷入低谷，許多居民紛紛離開，九份一度變得沉寂。

隨著金礦資源的枯竭，水金九地區的經濟活動逐漸減弱，當地人口也開始流失。這個時候，九份轉型為以旅遊為主的經濟模式，依靠其獨特的地質景觀和豐富的歷史文化資源，吸引了大量遊客前來參觀。這使得九份不僅是一個文化寶藏，還是一個具備科學價值的自然景觀區域。就在這短短的一個世紀的時間裡，經歷了多樣且快速的時空變遷，也使得不同世代的居民對於這片土地產

生了截然不同的印象與記憶。這也使得不同時代的居民對於地方認同的看法會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有所轉變。

時空動態指的是地理現象隨時間與空間持續發生的變化過程。這些變化可以透過不同時間與空間解析度的資料如遙測影像的形式被捕捉，並藉由整合這些快照，重建出地理現象在時空中移動與演變的軌跡（Yi, 2014）。但本研究強調的時空動態主要圍繞社會、經濟、文化與自然環境在不同時期與空間範圍內交織變化的過程。這種變動不僅體現在土地利用、聚落型態或產業結構的空間重組，更深刻影響了地方歷史記憶、居民生活樣態與地方認同的形塑。

基於上述原因，本研究嘗試以不同時空背景的角度來了解水金九地區居民的地方認同感，並進一步探討水金九地區居民對於地質公園的認知，進而了解地質公園未來的可行性。

在此將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1. 研究水金九地區居民對於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地方認同感。
2. 探討導入地質公園後水金九地區居民對於地方認同感的變化。
3. 探討其他影響地方認同感的潛在因子。

透過訪談當地居民及地質公園重要的驅動者，達成以上三個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對象與範圍

本研究的對象以水金九地區的當地居民及地質公園相關人員。根據新北市民政局統計 2024 年 9 月新北市萬芳區人口數為 36,515 人。其中九份為三地之中人口數最多的一區，人口來到了 1,581 人；金瓜石其次人口為 979 人；水湳洞人數最少只有 978。合計水金九地區居民人口約 3,538 人。

如表一所示，於空間範圍上，本研究針對九份、金瓜石及水湳洞地區進行探討，故在研究空間上僅限制於新北市瑞芳區域範圍上，其中以九份地區（永慶里、基山里、崇文里、福住里、頌德里）、金瓜石地區（石山里、瓜山里、新山里、銅山里）及瑞濱地區中的水湳洞地區（南雅里、濂洞里、濂新里）為研究範圍。

表一：水金九地區居民人數調查

年	月	隸屬區	里	鄰數	戶數	男	女	合計
九份地區								
113	9	瑞芳區	永慶里	13	216	213	187	400
113	9	瑞芳區	基山里	15	199	222	200	422
113	9	瑞芳區	崇文里	10	157	153	135	288
113	9	瑞芳區	福住里	8	86	87	76	163
113	9	瑞芳區	頌德里	10	164	164	144	308
金瓜石地區								
113	9	瑞芳區	石山里	13	164	163	133	296
113	9	瑞芳區	瓜山里	11	98	83	82	165
113	9	瑞芳區	新山里	11	171	181	154	335
113	9	瑞芳區	銅山里	12	100	105	78	183
水湳洞地區								
113	9	瑞芳區	南雅里	9	94	131	127	258
113	9	瑞芳區	濂洞里	20	242	210	238	448
113	9	瑞芳區	濂新里	10	123	132	140	272

本研究整理（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除了當地居民，我們的研究對象也包含了水金九地質公園重要的驅動者，他們不一定是水金九地區的居民，但他們為了水金九地質公園聚集在這個地方。在 2022 年黃金博物館推出了「九份金瓜石水滴洞地質公園：解說員培訓課程」在此之後成功培養了 40 位左右的導覽員及相關人才。本次的研究對象也會把他們納入其中。



第三節 研究內容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導入地質公園後水金九居民的地方認同感時空動態，以水金九地區居民及地質公園人才為主要研究對象，透過導入地質公園的概念是否對水金九地區居民的地方認同感有所提升。本研究主要分為五個章節進行研究，分述如下：

首先針對地質公園相關議題及水金九地區歷史作為結合，敘述研究之背景與動機。其次，歸納出研究方向與整體的初步概念。

透過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討論，瞭解地方認同、地質公園之主要意涵及水金九地區相關歷史文獻，建構出本研究主體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方法，詳細說明所選取的樣本，以及本研究為何採量化研究之主要因素。

針對實地訪談報告，進行資料分析，並探討在導入地質公園下，水金九地區居民對於地方認同感的現況。

藉由前述理論基礎與訪談資料結果分析，歸納出本研究之結論，並提出後續建議。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地方認同感

地方認同感（place identity）是跨越地理學與心理學的重要概念，反映人與地之間深層的聯結。在人文地理學中，地方不僅僅是客觀座標位置，更承載了人文與社會心理內涵。同時，「認同」關係到個體如何在社會文化情境中定位自身。在此背景下，「地方認同感」成為近年研究焦點，它結合了「地方」與「認同」兩大主題。本文從地理學角度出發，綜述相關文獻，分別討論「地方」、「認同」與「地方認同感」三部分的理論內涵與研究發現，最後提供綜合分析。

（一）地方（Place）

在地理學中，「地方」不僅指一個地點，更意指具有獨特意義與價值的空間。Relph (1976)強調一個地方之所以成其為「地方」，在於人們賦予其特殊的情感和意義，而非僅僅地理坐標。相對於抽象的「空間」，「地方」包含人與環境互動所產生的記憶、符號和認知意義。

每個地方都有其獨特的特徵和身份。Paasi (2003)提出可區分地方本身的認同與人們對地方的認同兩個層面。前者指地方的自然與文化特質，以及在人們談論、分類地方時所用以區別該地方的種種標誌，後者則是指個體對某地方產生歸屬感和身份認定。地方的獨特性使其能在政治宣傳、區域行銷和旅遊等話語中被強調，用以區隔不同地區。值得一提的是，現代化和全球化可能導致不同地方趨同，出現 Relph 所謂「無地方感」（placelessness）的現象——各地景觀變得相似，地方本身的獨特身份被削弱。隨著全球化力量逐漸侵蝕在地文

化，導致全球空間日益趨於均質化，對地方感消逝的哀嘆早已成為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在西方社會中屢見不鮮的現象(張雅媚，2023)。大眾傳播、交通與人口流動的強化，以及消費導向的社會形態，皆被視為加速全球同質化進程的主要推手。然而，人們依然對自己所處的地方懷有強烈情感。人們對地方產生的意義聯結可跨越日常居所到整個區域的不同尺度，不僅會認同自己的住所，也可能認同所在的社區乃至更大的地域。Cuba and Hummon (1993)的研究顯示，人們會在住宅、社區和區域等不同層級上發展出「家的感覺」和認同，且這種「地方感」(sense of place)深刻影響個體對自我的理解。地理學視角下的「地方」是具象的地理空間與主觀意義世界的交融體，其獨特性與意義賦予為後續「認同」的形成提供了場域基礎。地方是人們出發的起點，也是孕育與滋養個體的根源。每位地方成員對於所處環境的依賴與理解各有不同，這源於他們與地方之間從過去到現在的連結與經歷雖有共通處，卻也存在差異。然而，正因如此，他們能夠彼此分享這些獨特經驗，進而激盪出多元且交織的地方意識(張雅媚，2023)。

(二) 認同 (Identity)

「認同」(identity) 原指個體對於「我是誰」的認知與定位，涵蓋了自我概念和社會歸屬兩方面。認同是精神分析論創始人佛洛伊德理論的術語，其原意是指個體潛意識地向別人模仿的歷程(何昕家，2021)。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連結可視為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而地方心理學則認為，個體普遍渴望從所處的地方獲得一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並非一蹴可幾，而是透過三種心理歷程逐步建立而成，分別為：「熟悉」指的是對環境的了解與日常互動所帶來的安全感；「依戀」源自於個體與地方之間持續的情感投射與正面經驗的累積；「認同」即個人將地方視為自身身份的一部分，透過地方來理解「我是誰」。

這三者交織作用，使地方不僅僅是生活的背景，更成為情感寄託與自我建構的重要依據(Chau, 2021)。

在地理學與相關領域中，認同同樣涉及空間維度。Bird (2002)研究指出，人們透過共享的在地敘事來構建文化認同；這些「地方故事」不僅傳遞歷史，更在日常生活中界定了誰屬於此地、誰被排除在外。認同具有將人群團結的作用，也有一定的排他性，地緣因素常是其中重要的一環。

個體的身份認同包含個人層面和群體層面。個人身份側重獨特的自我定位，包括價值觀、記憶和人格特質；群體身份則源於與他人共享的屬性，如種族、宗教、國籍，當然也包括地域。認同的形成是一個在特定社會文化情境中逐步確認「自我屬性」的過程(朱竑等人, 2012)。從社會心理學角度看，身份認同具有維繫自我連續性、彰顯獨特性、提升自尊和實現自我效能等核心功能。Breakwell 提出的身份動態理論正是強調個體力圖保持自我形象的一致和獨特，同時追求自我價值與掌控感。在地理情境中，人們經常透過所屬的地方來滿足這些身份需求，如以家鄉為榮凸顯自身獨特性。事實上，區域或地方層面的集體認同也是身份的重要形式。Raagmaa (2002)指出，區域認同是一種在具體物質與社會空間中被社會生產、感知、再生產和記憶的產物。這意味著某地區的人們通過共享的文化、傳統與社會互動，塑造出該地區共同的身份意象。Paasi (2003)也強調區域的身份建構包含邊界、象徵和制度等面向的塑造，使區域成為人們認同感的載體之一。概言之，「認同」涵蓋了個體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與群體、空間的連結，在地理學中尤其關注人群對特定空間單元（地方、區域、國家等）的歸屬與象徵性認同。

（三）地方認同感（Place Identity）

「地方認同感」融合了上述「地方」的意義與「認同」的機制。「地方認同感」指的是特定的地方如何與人們的自我認知相互交織，強調地方對於個人或群體自我認同形成的重要性。近數十年來，地方認同已成為地理學領域理解自我認同形成、歸屬感及人地關係的重要概念（朱竑，2010）。從人文地理學的經典理論，到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地方認同經歷的理論發展，近期學術研究更將此概念運用於全球化與環境變遷議題。

環境心理學家 Proshansky 在 1978 年第一次引介了「地方認同」概念，他將其定義為個人認同中關涉物理環境的次組成。地方認同感是人們透過與環境互動所形成的自我定義，包括對特定環境的想法、感受、價值和行為傾向等綜合體。Proshansky 強調，地方認同是「客觀物質世界社會化了的自我」，既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同時也包含對物理環境的認知和依戀 (Proshansky, 1978)。

段義孚 Tuan (1977) 提出「戀地情結」(topophilia) 的概念，將人對地方的深厚情感形容為一種愛戀關係，即人與環境之間的情感依附。地理學者對地方認同感的理解則常同區域意識相聯繫。Paasi (2003) 認為解析地方認同感應兼顧地方的身份與對地方的認同兩面。Paasi 指出，一方面地方本身自然與文化特徵賦予的身份；另一方面，生活在這空間的人也發展出對該地方的歸屬感與認同。這兩個層面相互影響：人們賦予地方的意象會反映在自己的身份認同上，而個人對地方的情感也會投射為對該地的描述。然而，以往研究往往只側重其中一面。近期有學者開始探討二者的互動，例如提出「區域的主體性認同」概念來聯結地區客觀形象與主觀歸屬。何昕家 (2021) 認為地方認同感是一種對空間所產生的情感與記憶，雖無形無狀，卻深深植根於個人或群體的經驗之中。它並非單靠地理位置即可定義，而是由社會、文化、歷史、環境與政治等多重因素交織建構而成的觀念性存在。地方感是一種主觀的感受，無法被直接

觸摸或觀看，卻存在於每一個我們熟悉並賦予意義的空間中，使這些地方不僅僅是物理上的座標，更成為我們記憶、認同與歸屬的重要承載體。

實證研究證實了地方認同感在個人心理與行為中的作用。Twigger-Ross and Uzzell (1996)以 Breakwell 身份理論為框架，考察英國居民如何透過居住地滿足身份需求。研究發現，穩定的居住環境可提供連續性（如世代居住同一地帶來的歷史延續感）和自我效能（熟悉環境提高掌控感），而獨特的地方特質則滿足了居民的自尊和獨特性需求。也就是說，人們往往利用「我是某地方人」這一身份來維繫和強化自我概念。洪世謙 (2022)也有提到類似的想法，他覺得地方感與參與感，都是對社區帶來積極影響的因素，能促成社區共生的良性循環。

另外，Cuba and Hummon (1993)的研究顯示個體透過認同於住所或社區來區別「我們」與「他者」，強化了自我的獨特定位。研究還發現，積極參與在地社群生活是培養地方認同感的重要途徑：參與社團、鄰里活動等能顯著提升個體對所在地的歸屬感和「家園」意識。由此可見，地方認同感既受到個人經驗影響，也取決於社會互動與參與程度。

地方認同感不僅影響個體的心理狀態，還會反映在態度與行為上。Bonaiuto et al. (2002) 探討了地方認同與環境態度的關聯，發現在自然保護區設立情境中，當地居民對環境變遷的支持度取決於其地方認同感強度。一般而言，對家鄉認同感越強的人，越關心家鄉環境變化，並傾向於維護地方利益。相似地，余明仁和張訓 (2018)的質性研究發現，外來移居者在新地方建立起情感聯繫後，其地方認同感逐步增強，進而開始主動關懷並回饋當地的人事物。他們提出，情感依附先於認同產生，而認同一旦形成，個體便會視該地為「家」並投入維護。有些移居者對新居地的認同與歸屬甚至超過了對原故鄉的認同，將新居地視為真正的安身之所。可見，地方認同感具有隨著個體經歷與

環境變遷的動態特質，認同對象也可能轉移。Chau (2021)認為唯有當人對某個地方產生深刻的歸屬感時，這片土地才會被視為「家」，而不只是單純的居住地或日常活動的場域。這種歸屬感使地方成為情感的寄託與身份的一部分，超越了空間的物理性，轉化為具有意義與記憶的所在。

近年來，學者開始關注不同社會與空間背景下地方認同感的差異。

Belanche et al. (2021) 的研究比較了城鄉居民的地方認同構成。結果顯示鄉村居民在地方認同的情感和評價維度上明顯高於城市居民，而在認知認同（對社區的歸屬感）上二者差異不大。這意味著，相較都市人，鄉村居民對所在地情感連結更深、自我評價更依賴於地方身份。此一發現與常識不謀而合，也就是農村社區更緊密的人際網絡與穩定的生活空間，有助於培養強烈的地方歸屬與自豪感。

（四）相關概念

「地方認同感」與其他相關概念既有聯繫又有區別。例如，地方依附（place attachment）著重描述人對地的情感連結，而地方認同更側重這種連結如何融入個人身份。Lewicka (2011) 指出地方認同、依附、屬地感（sense of place）等概念間的界線有時模糊。一般而言，地方依附是地方認同感的重要組成部分——強烈的情感依戀往往催生對地方的身份認同。但地方認同還包含認知評價和自我定義層面，例如將自己視為某地人並從中獲得自尊。不少研究致力於區分和測量這些構面，例如有學者將地方認同劃分為認知認同（對社區的歸屬感）、情感認同（情緒依戀）和評價認同（對地方的滿意與自豪）三個成分。這些維度的細分有助於深入了解地方認同感的內涵及其作用機制。

地方認同感作為人地關係的核心概念，已成為人文地理學與環境心理學交叉研究的重點。無論是從 Relph 等人強調的地方意義，還是 Proshansky 提出的

自我認同組成，抑或 Paasi 關注的區域意識建構，相關文獻共同表明：人對地方的認同是個體自我與外在環境互動的產物。它使人們能夠透過「地點」來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地方認同感具有多層次、多面向的特性，其影響遍及居民滿意度、環境保護行為、旅遊態度等各個方面。未來，隨著城市化與移動性的持續推進，地方認同感將持續演變並對個體和社群產生深遠影響。我們有必要持續關注人地關係中的認同建構，深化對地方意義與人類福祉之間聯繫的理解。

Relph (1976)指出地方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意義空間，深入體驗地方可產生「存在的地方感」；相反地，缺乏歸屬則導致「無地性」。當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連結遭到破壞時，便會產生與歸屬感相對的三種心理歷程，分別是「定向消失」指個體失去對空間的認知與熟悉感，彷彿被迫置身於陌生之地；「懷舊」指對過去地方經驗的理想化回憶，反映出對當前環境的不滿與失落；以及「疏離」指人與地方失去情感連繫，對所處環境感到冷漠甚至排斥。這些心理反應不僅削弱了個體的在地認同，也影響其參與公共生活與維繫社區連結的意願(Chau, 2021)。段義孚 (Yi-Fu Tuan) 提出「戀地情結」(topophilia) 的概念，將人對地方的深厚情感形容為一種愛戀關係，即人與環境之間的情感依附。Agnew (1987) 進一步將「地方感」界定為集體身分的一部分，認為人的自我認同包含對特定地方的歸屬，地方因獨特特質而成為集體認同的重要來源。簡言之，地方認同感是指個體對其所處空間或地方所產生的情感依附與歸屬感，這種認同建立在日常生活經驗的累積之上，並深刻影響自我定位與集體身分。當人們能夠深入體驗並理解地方時，會產生強烈的存在感與戀地情結；相反地，若人與地方的連結遭到破壞，則可能產生定向消失、懷舊與疏離等心理反應，進而削弱其參與公共生活與社區連結的意願。因此，地方認同感不僅是一種空間情感，也是一種影響社會互動與社區凝聚力的重要心理機制。

第二節 地質公園的起源與發展背景

地質公園的概念源於 20 世紀末國際間對地質遺產保育的重視。相較於生物多樣性，地質多樣性與地景長期以來在保育領域中屬於相對弱勢，因此 UNESCO 在 1990 年代末提出了「地質公園」的構想，試圖建立一套保護地質遺產的新框架(Patzak and Eder, 1998)。1997 年 UNESCO 開始研議地質公園計畫，並於 1998 年提出相關原則與建議，將地質公園定義為一種涵蓋多處具有地質意義景點的保護地帶，同時結合科學教育與觀光發展的新模式(Patzak and Eder, 1998)。這一構想獲得各國地質學界的迴響，為後來地質公園網絡的形成奠定了基礎。Martini and Zouros (2009)指出，地質公園在理念上與傳統國家公園有許多相似之處，同為以地景保育為目標的空間單元，但地質公園更強調對地質遺產的認識與活化利用，而非僅僅實施嚴格的保護措施。地質公園是 Geopark 的中文翻譯，其中「Geo」代表地球、土地、地理或地質，「Park」則是一定範圍的園區。雖常被誤解為僅與岩石相關，實際上 Geopark 所關注的不只是自然地景，更涵蓋人與土地、社區之間的互動與共生。因此，Geopark 更應被理解為「地球公園」或「大地園區」，是一種融合自然、人文與永續精神的空間概念，反映人與地之間深層的連結與哲學(王文誠, 2022)。

地質公園的實踐發展始於歐洲。2000 年，歐洲地質公園網絡 (European Geoparks Network, EGN) 正式成立，最初由法國、德國、希臘、西班牙等地的四個地質公園發起，包括德國的瓦爾卡尼埃弗地質公園等作為創始成員(Frey et al., 2006)。EGN 的成立標誌著地質公園從理念走向現實，各地開始將具有地質價值的景區納入地質公園體系進行管理。之後在 UNESCO 的倡導下，2004 年於中國北京舉辦的國際會議上宣佈成立「全球地質公園網絡」 (Global Geoparks Network, GGN)，將歐洲地質公園網絡擴展為全球性合作架構，同時吸納亞洲等地的地質公園加入(Martini & Zouros, 2009; McKeever et al., 2010)。

在這一全球網絡下，來自不同國家的地質公園彼此交流經驗、共享資源，形成跨國的地景保育合作體系(McKeever et al., 2010)。例如，中國自 2000 年起推動國家地質公園計畫，累積了數十處國家級地質公園，並積極參與全球地質公園網絡，成為全球地質公園數量增長的重要推手之一(Martini and Zouros, 2009)。另外，在台灣的雲林草嶺地質公園自 2004 年試行，2020 年成為法定地質公園後逐漸受到重視。交通部配合「大南方」計畫，結合多個區域聯盟，推動草嶺成為地質公園網絡中的新節點。透過地景保育與觀光整合，讓在地居民得以生產、生活並參與旅遊發展，實現生產、生態、生活三生共融，展現偏遠地區的自信與價值(王文誠, 2021a)。

地質公園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於全球擴張，與其獨特的保育與發展並重理念密不可分。傳統的自然保護地（如國家公園）多強調生態環境的嚴格保護，限制人為開發活動；相較之下，地質公園採取「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模式，將在地社區視為保育夥伴，並通過地質旅遊促進地方經濟，使保育與發展相輔相成(王文誠, 2015)。王文誠 (2015)比較國家公園與地質公園制度時指出，地質公園提供了一種新的地景保育途徑，鼓勵社區投入保育工作、推動環境教育，同時帶動地方經濟振興，展現出與傳統保育模式不同的治理思維。在這樣的理念感召下，許多原本缺乏資源投入的地質遺產得以藉由地質公園的設立而獲得關注與維護，地質公園體系也逐漸被視為地景保育的新典範(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

（一）UNESCO 全球地質公園網絡與政策架構

在地質公園理念逐步落實各地之際，UNESCO 亦扮演了關鍵的推動與協調角色。2004 年成立的全球地質公園網絡（GGN）最初由 UNESCO 以倡議者和協調者的身分加以推廣，儘管當時地質公園並非 UNESCO 正式名錄下的法定保護區類別，但 UNESCO 透過其科教文組織的平台，為這些地質遺產地區提供了國際背書與技術支援(Martini & Zouros, 2009; McKeever et al., 2010)。McKeever et al. (2010)強調，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的建立為各地提供了一個在非限制性保育架構下合作的機會，成員間能在保護地質遺產的同時，共同創造發展機遇。這種以網絡形式運作的模式意味著，各地質公園仍由所在國或地方政府管理，但在 UNESCO 的主持下定期交流經驗、遵循共同的準則，形成鬆散而有凝聚力的國際夥伴關係（McKeever et al., 2010）。這種國際合作架構使得地質公園不再是單一孤立的保護地，而是一個全球性的學習型網絡，有助於提升整體地景保育水準(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

2015 年是地質公園發展的重要里程碑。該年 11 月，UNESCO 第 38 屆大會正式通過決議，將地質公園納入 UNESCO 的正式計畫架構下，成立「國際地球科學與地質公園計畫」（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and Geoparks Programme, IGGP），並將通過審查的成員授予「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UNESCO Global Geopark）的稱號。自此，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成為繼世界遺產、生物圈保護區之後，UNESCO 促進自然與文化遺產保育的第三大倡議類別(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根據 UNESCO 與全球地質公園網絡訂定的定義，世界地質公園係指“單一且完整的地理區域，其中包含具有國際地質意義的遺址與景觀，並透過整體性的保護、教育和永續發展理念加以經營管理”(Network, 2015)。這一定義強調了幾個核心要素：其一，地質公園內的地質遺產價值須達到國際重要性；其二，管理單位須採取整體性策略，兼顧地質遺產的保護、科

學傳播與社會經濟發展；其三，區域範圍須為明確且連貫，以便統一規劃與運作(Network, 2015)。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指出，UNESCO 將地質公園納入正式網絡，反映出地質公園已被視為實現全球永續目標的關鍵策略之一，特別是在促進地方社會對地質遺產的認識、參與在地發展以及促進國際間理解方面，地質公園被 UNESCO 視為示範性的實踐場域。

在政策架構方面，UNESCO 全球地質公園網絡制定了一系列指導方針與評估機制，以確保會員地質公園遵循共同的標準並持續改進。首先，新申請加入網絡的地質公園必須提交詳盡的計畫書，內容涵蓋地質遺產價值評估、管理架構、社區參與計畫、地質教育推廣策略以及地質旅遊發展方案等。這些提案經由國際專家小組審議，以確認其是否符合 UNESCO 的理念與標準(Network, 2015)。一旦獲准加入，該地質公園即成為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享有 UNESCO 招牌帶來的國際能見度，但同時也承擔維持品質的責任。為此，UNESCO 要求每一座世界地質公園每四年接受一次再驗證（revalidation），由國際評估專家實地訪查，檢視其在地質保育、環境教育、社區參與和永續觀光等方面的進展與成效(Network, 2015)。若未達到要求，可能面臨限期改進或撤銷資格的處置。這種定期評鑑制度確保了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員維持一定水準，形成良性競爭與學習的環境。McKeever et al. (2010)強調，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的成功在於其靈活且具包容性的架構：各地質公園在法律地位上可維持彈性（通常不新設額外保護地法規，而是結合現有的土地用途管理），但在理念與運作上遵循 UNESCO 所倡導的整合式方針，例如強調科學研究與科普教育並重、尊重當地社區意願，以及追求永續發展而非短視的經濟利益。總體而言，UNESCO 通過全球地質公園網絡建立了清晰的政策架構，一方面提升了地質遺產保育在國際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提供了具體的運作指南與評估機制，確保地質公園這一新興保育模式能健康發展並在全球範圍內產生深遠影響(Henriques & Brilha, 2017; Network, 2015)。

（二）地景保育

地質公園與國家公園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皆致力於保護自然地景與生態環境，強調教育、觀光與社區參與的平衡發展。不同的是，地質公園更聚焦於地質地貌與人地互動的展示，強調地方認同與永續利用，是融合保育與在地生活的一種創新模式(施照輝, 2022)。地質公園的核心使命之一在於保存地質遺產與維護地質多樣性 (geodiversity)。地質多樣性指的是地球上各種岩石、礦物、化石、地形與地貌等非生物自然要素的多樣性及其組合所構成的豐富程度，它與生物多樣性相輔相成，共同構成自然界的多樣性基礎(Brilha et al., 2018)。Brilha et al. (2018)指出，在傳統保育體系中，人們往往關注於動植物等生物遺產，而忽略了地質遺產的重要性；然而實際上許多地質現象不僅蘊含獨特的科學價值，也是塑造景觀和孕育生態系統的基礎。因此，維護地質多樣性對整體自然保育至關重要。地質公園正是因應這一保育觀念而興起的創新制度，透過將具代表性的地質遺址納入保護和管理，確保關鍵的地質多樣性要素得以傳承(Henriques & Brilha, 2017)。通過地質公園的設立，這些散佈各處的地質瑰寶被整合到一個區域管理單元下，加以調查、紀錄並妥善保護，避免因自然風化或人為干擾而受損。此外，地質公園強調在保護中進行科學研究和監測，持續增進對地質多樣性的了解，如定期對園區內的重要地質點進行檢視評估，藉此追蹤地質遺跡的保存狀況。這種主動式的地景保育策略，有助於及早發現潛在的威脅並採取管理行動，體現了地質公園對地質多樣性保育的積極角色(Fauzi & Misni, 2016)。

更重要的是，地質公園的保育範疇不僅侷限於單一地質點的維護，而是擴大到整體地景 (landscape) 的永續經營。Martini and Zouros (2009)強調，地質公園的理念是在一個完整的地理空間中實現地質遺產的綜合管理，這意味著保育對象包含了地景中的多個地質要素及其相互關聯。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

亦指出，地質公園採行的是一種整體性的地景保育觀：透過保護地質，進而及於生態與文化。許多地質公園所在區域常同時擁有珍貴的生物生境與人文景觀，地質公園的管理鼓勵將這些不同面向統籌考量，以達成「一處保育，多重收益」的效果。

在維護地質多樣性方面，地質公園亦扮演著開發評估方法與指標的試驗場角色。黃家俊和紀權官（2021）提出，從地質觀點出發建立地質多樣性評估機制，能有效協助地質公園確認園區內重要的地質元素和區域特性，進而制定有針對性的保育策略。透過利用稀有度、代表性、完整性等量化指標評估，可以客觀地判斷哪些地質景觀最值得優先保護，以及目前保育措施的成效如何。這類評估不僅對地質公園內部的管理有益，也為不同地質公園之間的地質多樣性比較提供了依據，有助於全球地質公園網絡瞭解整體的地質遺產保護狀況(Fauzi & Misni, 2016)。此外，Brilha (2018)強調地質遺產清單和評分系統在地質公園管理中的重要性：透過製作詳細的地質遺產清單（包括地質遺跡點的科學價值、教育價值和美學價值等），管理者可以更有效地分配資源，確保關鍵地質多樣性要素獲得充分的關注和保護。綜上所述，地質公園在地景保育與地質多樣性維護上提供了一種整合性的模式，不僅將零散的地質遺址納入系統管理，還透過科研與監測提高了保育效率，進一步把地質多樣性的理念落實到區域永續發展的實踐中(Brilha et al., 2018; Henriques & Brilha, 2017)

（三）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Environmental Education）是地質公園的核心功能之一，地質公園被視為天然的「學習性地景」（learning landscape），為公眾提供在真實環境中學習地球科學的機會(王文誠, 2021b)。所謂學習性地景，指的是將真實的地

質現象與景觀作為教育場域，透過現地觀察與體驗來激發學習者對地質知識的興趣與理解。Patzak and Eder (1998)在提出地質公園概念時即強調，地質公園應充當地球科學的露天教室，讓訪客能夠在遊覽過程中獲取有關地質歷史和地貌演化的知識。環境教育隨著人類對經濟、社會與環境認知的提升而不斷演進，採問題解決與議題導向方式，讓學習者理解當前環境挑戰，培養行動力與責任感，最終目標是促進具行動力的公民與參與式遊客的養成(伍家稚, 2023)。Frey et al. (2006)也指出，一個成功的地質公園應該結合解說設施、教育活動與當地故事，將冷僻的地學知識轉化為大眾容易理解且感興趣的內容，從而達到寓教於樂的效果。在實務上，大多數地質公園都設置了遊客中心或地質博物館，展示園區內的代表性地質標本、圖像和模型，同時提供圖文並茂的解說資訊，以協助遊客在進入地景現場前對相關知識有所瞭解(陳柏廷, 2016)。此外，地質公園內常規劃解說步道與解說牌，將每處地質景觀的形成背景、科學意義以淺顯易懂的語言加以說明，方便遊客自助學習。而針對有導覽需求的團體，地質公園也培訓專業的地質解說員，透過現場講解深化訪客的學習體驗(Azman et al., 2010)。這種多元的教育詮釋體系，使地質公園的每一處景觀都成為學習素材，整個園區宛如一本立體的地質教科書，滿足不同層次遊客的求知欲(Frey et al., 2006)。

地質公園的教育功能不僅針對遊客，更重要的是促進在地社區對自身地質遺產的認識與珍視。Azman et al. (2010)對馬來西亞蘭卡威世界地質公園的研究顯示，透過在地社區參與的地質教育計畫，當地居民對於地質遺產的價值有了更深的理解，並逐漸將保育觀念融入日常生活。該研究指出，在蘭卡威推行的社區地質教育活動包括培訓當地導覽員、舉辦社區講座以及鼓勵學校將地質公園作為戶外教學場域等，這些措施大大提升了居民的參與度和自豪感(Azman et al., 2010)。事實上，社區居民往往是最好的環境教育推廣者：當他們對家鄉的地質故事有了認識，便更願意向外來訪客介紹，形塑出主人翁意識，進一步強

化了地質公園的教育功能。王文誠 (2015)也強調，地質公園提供了在地社區實踐環境教育的平台。這種以社區為本位的教育模式，不僅培養了下一代的地質保育意識，也促進了社區居民代代相傳對土地的情感與認同 (王文誠, 2015)。由此可見，地質公園中的地質教育具雙重意義：對內，它提升了在地居民的地學素養，凝聚社區保育地景的共識；對外，它讓更多公眾接觸並理解地質科學，進而支持地質遺產的保存(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

學習性地景的概念在地質公園的教育實踐中具體體現為多樣化的學習機會和互動體驗。其中，鶯溪地質公園在推動學習性地景的歷程中，展現了由社區、學校到在地組織共同參與的多元教育模式。無論是非正規的社區協作、社會教育，或正規的學校課程與實驗教育，其核心始終如一：讓兒童和學生向在地敘述者學習，從地方經驗中建立認同與理解。這樣的教學實踐不僅深化了學校與社區的合作，也逐步提升地質公園內多方權益關係人的社會能量，展現偏遠地區的信心與價值(王鈴琪等人, 2021)。許多地質公園開發了創新的教育資源，例如地質知識闖關遊戲、擴增實境 (AR) 導覽應用程式等，增強學習的趣味性與互動性(陳柏廷, 2016)。此外，針對偏好深度學習的族群，地質公園亦提供地質講座、專題工作坊、野外考察等進階活動，由專家學者帶領參與者進行較深入的地質探討，滿足地質愛好者的需求(Azman et al., 2010)。這種因材施教、分眾經營的方式，使地質公園的教育價值能廣泛惠及不同背景的受眾。總而言之，透過將地景轉化為教室、將遊客轉變為學習者，地質公園有效實踐了學習性地景的理念，成為連結專業知識與大眾之間的重要橋樑，達成提高公眾地球科學素養與保育意識的目標(Azman et al., 2010; Patzak & Eder, 1998)。

(四) 地質旅遊

地景旅遊 (geotourism) 是地質公園促進地方發展的主要途徑，也是其實現永續發展目標的重要策略。Farsani et al. (2014)將地質旅遊定義為以地質和地貌資源為核心吸引力的一種特殊旅遊形式，強調在旅遊過程中結合地質知識傳播與休閒體驗，讓遊客在欣賞美麗景觀的同時增進對地球科學的理解。與傳統觀光不同，地質旅遊更注重教育意涵和環境敏感性，被視為生態旅遊的一種延伸與拓展(Farsani et al., 2014)。在地質公園的脈絡下，地質旅遊承擔著平衡保育與發展的雙重任務：一方面透過創造負責任的旅遊活動來帶動地方經濟，為社區提供就業機會與收入來源；另一方面，將旅遊活動控制在環境可承載範圍內，避免對地質遺產和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確保旅遊的永續性(Henriques & Brilha, 2017)。對此，蔡倩雯 (2021)提到觀光業雖促進經濟，但也帶來環境破壞與管理成本。為達永續發展，休閒農場應兼顧經營與環境保護責任，透過遊客管理與教育提升環境意識，減少不當行為對自然資源的衝擊。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指出，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被視為實踐全球永續觀光的示範區，因為其發展模式體現了“在保護中發展、在發展中保護”的理念。許多地質公園所在地原本經濟相對落後，透過結合地質旅遊，這些地區開始將沉睡的地質遺產轉化為觀光資產，吸引遊客前來探索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從而為地方帶來經濟活力(Farsani et al., 2014)。由此可見，地質旅遊作為地質公園的重要策略，具有將地質遺產價值轉化為經濟價值的潛力，同時通過精心管理實現環境、社會與經濟三贏的永續發展目標。

為了確保地質旅遊的永續性，地質公園在旅遊產品開發與經營策略上特別講究創新與在地融合。Frey et al. (2006)提出「地質產業品」(geoproduct)的概念，指的是將地方傳統產品與地質公園的獨特地質主題相結合，創造出具有教育意義和紀念價值的商品。例如依據當地特殊礦石或化石形態設計的文創產

品、融入地質傳說的特色美食、或以地質景觀為元素的手工藝品等，都屬於地質產業品的範疇(Frey et al., 2006)。因此，林俊全 (2022)提出地質公園產品競賽除了鼓勵創新，也提供各地質公園互相觀摩與學習的機會。透過參與網絡會議與交流訪問，社區能獲得靈感，激發更多發想。儘管多數地質公園仍在發展初期，未來有望推出更多具創意與特色的產品。這類產品不僅提供遊客將地質公園體驗帶走的具體紀念，也為在地居民創造新的經濟機會，加深社區參與感。同時，地質公園也發展出各式各樣的地質旅遊路線與活動，如地質健行步道、火山探秘之旅、化石挖掘體驗等，滿足不同旅客的興趣(Farsani et al., 2014)。這些活動通常由受過培訓的當地嚮導帶領，他們能生動地講述地質景觀背後的故事，使旅遊過程成為寓教於樂的探索之旅(Azman et al., 2010)。在策略上，許多地質公園採取預約制或限定人數的方式來管理脆弱景點的旅遊承載量，以減輕人為壓力(Farsani et al., 2014)。同時，鼓勵淡季旅遊或開發不同主題的旅遊產品，以分散訪客時空分佈，減少旺季對環境的衝擊，這些都是地質公園追求永續觀光所採用的措施。值得一提的是，地質公園的旅遊策略往往與環境教育相結合，透過要求遊客遵守遊憩守則、參與淨山淨灘等活動，來提高其環境意識，塑造「負責任旅遊者」的態度(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Fauzi and Misni (2016)在永續地質旅遊指標的研究中強調，監控旅遊活動對地質和生態環境的影響是確保永續發展的關鍵，因此地質公園管理者需定期評估旅遊開發是否維持在可持續水平，包括遊客滿意度、環境品質指標以及社區受益程度等，以適時調整策略。透過這種適應性管理，地質公園得以在開放大眾欣賞地球之美與保障地質遺產長久保存之間取得動態平衡(Fauzi and Misni, 2016)。

綜合而言，地質公園的地質旅遊實踐展示了一種新型的永續發展模式：它將地質科學知識、人文故事與觀光體驗有機融合，在滿足遊客求知與休閒需求的同時，為地方社區帶來經濟收益並強化其保育地景的意識(王文誠, 2015; Farsani et al., 2014)。Henriques and Brilha (2017)將 UNESCO 世界地質公園譽為

全球永續地質旅遊的典範，說明其不僅促進了跨文化的地學知識交流，更通過負責任的旅遊實踐，達成了保育地球遺產與促進人類福祉的共同目標。

（五）社區參與

社區參與（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地質公園運作中極為重要的元素，也是地質公園得以實現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的關鍵動力之一。Liu (2022)提到當居民長期在社區生活，會產生情感上的地方依附，進而凝聚力量推動地方發展，形成地方認同。當這種認同轉化為實際行動，便成為社區參與。雖然社區參與常受政府政策推動，但並非所有居民都會主動投入，因此部分居民會組織社區發展協會，以更有系統地規劃與推動社區事務。所謂「地方創生」指的是透過在地資源活化與創新，重振地方經濟與社會活力的過程，而地質公園提供了這樣的平台，讓社區成員成為地景保育與經營的主角(王文誠, 2015)。王文誠(2015)的研究指出，地質公園的制度設計本質上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保育模式：相較於由上而下的傳統保育區劃定，地質公園更強調由下而上的參與，地方居民從規劃階段便加入討論，成為決策的一部分。這種參與式治理確保了地質公園的發展符合在地需求，也增進了社區對地質公園的認同感與支持度。類似地，許多歐洲的地質公園在申請之初即成立了在地協會或委員會，成員包括地主、商家、教師等各界代表，透過定期會議共商園區經營事項，確立公民參與的機制(Frey et al., 2006)。Azman et al. (2010)以蘭卡威地質公園為例，也發現當地社區逐漸成為地質遺產的積極守護者：居民不再視地質公園為外來的管制政策，而是將其視為社區資產，願意主動參與導覽、巡護、維護環境等工作，展現出高度的主人翁精神。總體而言，社區參與讓地質公園真正落地生根，形成「社區即公園、公園即社區」的格局：公園的保育和發展有賴社區支持，而社區的永續繁榮也因公園而獲益(Azman et al., 2010)。

地方創生方面，地質公園為許多偏遠和經濟轉型地區帶來了新的發展契機。地質公園的建立常伴隨著地質旅遊和相關產業的發展，這為當地創造了就業和創業機會。例如一些年輕人返鄉從事導覽解說工作或開設特色民宿餐飲，以滿足旅客需求，逐步扭轉過去外移的人口趨勢(Farsani et al., 2014)。王文誠(2018)研究加拿大偏遠地區的地質公園發展時，將其形容為「偏遠的驕傲」：在加拿大諸如史東漢默（Stonehammer）和坦布勒嶺（Tumbler Ridge）等世界地質公園所在地，原本地廣人稀、經濟仰賴傳統資源產業，但因地質公園的契機，當地社區團結投入資源將豐富的地質遺產包裝為旅遊亮點，成功吸引國際訪客，帶動服務業及周邊產業的興起(王文誠, 2018)。儘管地處偏遠，這些社區透過地質公園展現了自身獨一無二的價值與魅力，進而獲得來自外部的關注與投資，社區居民對家鄉的驕傲感也因此大大提升。類似的情形在歐亞許多地質公園皆有體現：例如一些昔日的工礦區、農業蕭條區，透過地質公園轉型為觀光熱點後，青年返鄉投入創業，開發地質主題的特色產品或體驗活動，使地方經濟結構更多元化(Farsani et al., 2014)。地質公園強調「在地創生、在地經營」，許多園區的管理機構會優先聘用當地人、採購當地物資，以確保經濟效益留在社區內(Azman et al., 2010)。同時，地質公園也鼓勵社區提出創新點子，例如舉辦與地景相關的文化節慶、發展地質環境教育中心等，藉此豐富旅遊內容並增強社區凝聚力(Martini & Zouros, 2009)。透過這些努力，地質公園逐漸成為地方創生的重要推手，使許多地區脫離過去過度依賴單一產業的困境，走向經濟、社會與環境協調發展的新路(王文誠, 2018)。

然而，社區參與與地方創生的推進並非沒有挑戰。地質公園需要兼顧不同利益相關者的期待，例如居民可能關心就業與收益，保育人士重視環境品質，遊客追求體驗滿意度等。許正賢 (2022)有提到 2020 年黃金博物館館慶面臨經費困難，館長謝文祥邀集三家在地團隊合作策劃活動，整合資源並提升價值，拓展在地與外部連結。活動前赴日本語言學校宣傳，擴大社會影響力。近年透

過工作坊與議題推廣，推動服務創新，最終實現活動整合與永續發展。為此，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與公平的利益分享模式至關重要(Azman et al., 2010)。一些成功的地質公園案例表明，透明的決策過程和明確的分工能增進各方信任，例如園區成立由政府、社區、專家共同組成的管理委員會，制定章程保障社區在決策中的發言權，同時劃分旅遊收益的一部分投入社區發展基金，用於公共設施改善或教育培訓，讓居民直接感受到地質公園帶來的好處(王文誠, 2015)。

Farsani et al. (2014)亦強調，在推動地質旅遊與創生時，要尊重在地文化與生活方式，避免因過度商業化而破壞了社區原有的社會結構。成功的地質公園往往能將當地傳統（如手工藝、節慶、故事傳說）與地質主題相融合，使旅遊發展建立在尊重在地文化基礎上，這不僅提升了旅遊體驗的深度，也使社區更願意投入其中。綜上，地質公園透過深度的社區參與機制和有利於地方創生的發展策略，實現了保育與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居民從地質公園獲益，進而更積極地支持保育與經營工作，最終達成社區與地質公園共同成長的目標(王文誠, 2018; Azman et al., 2010)。

本研究之地質公園分析架構，將地質公園視為融合保育、教育、觀光與社區發展。地景保育層面，地質公園強調地質多樣性之科學、教育與審美價值，透過地質遺址清冊、保護管理計畫與監測制度，實踐從單一遺址到整體地景之永續治理。環境教育方面，地質公園作為「學習性地景」，提供地質展示館、解說步道與社區解說員訓練，兼顧遊客教育與居民地學素養之提升，促進全民地球科學認識。在永續觀光層面，地質旅遊強調低衝擊與高教育價值，發展地質主題商品與互動體驗，並透過遊客容量控管與文化融合，推動地方經濟與保育並行。在社區參與與地方創生方面，地質公園採取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鼓勵居民參與導覽、決策與旅遊產品開發，強化居民的地方認同與經濟收益共享，達成地質保育與社區發展之雙贏。

第三節 水金九地區歷史與礦業背景

(一) 地名由來與地理區位簡介

水金九地區指的是新北市瑞芳區山城聚落九份、金瓜石與沿海聚落水湍洞一帶。九份位於臺灣東北部山坡地，臨山面海，因狹長陡峭的地形形成階梯式聚落風貌。關於「九份」地名，有兩種常見說法：其一相傳清代開墾初期此地交通不便、僅有九戶人家，每次外出採買必為九戶分成九份，遂以此稱村。另一種說法則基於學者考證，認為名稱源自早期樟腦產業的計量單位：當地曾有九十口樟腦灶，每十口灶稱一「份」，共計九份，故得名。(吳亞璇等人，2015)指出，清代時今日的金瓜石地區曾稱「九份庄」，而現在的九份當時名為「更仔寮」庄，日治時期1920年行政區劃調整，始將更仔寮改稱「九份」，原九份庄改稱金瓜石。1933年臺灣總督府又下令將「九份」大字改名為「金瓜石」，「九份」之名遂正式轉用於現今九份聚落。可見九份與金瓜石歷史上地名有過交錯，更凸顯此二地關係密切。

金瓜石位於九份東側，海拔約250-300公尺之丘陵山谷中，三面環山，北臨海岸陰陽海，東有無耳茶壺山，西以基隆山與九份為界，地形切割複雜，聚落較為分散。金瓜石地名來自清光緒年間於此發現一塊外形似金色南瓜的大礦石露頭，蘊藏豐富金脈；光緒19年（1893年）此「大南瓜」的發現引發淘金熱潮，為金瓜石名稱之由來(洪迺鈞等人，2015)。金瓜石原是人煙稀少的荒僻山區，光緒14年（1888年）才有零星居民遷入開墾。隨著清末至日治初期連續在九份、金瓜石一帶發現金礦，人口劇增、聚落快速發展，金瓜石一度與九份同為盛極一時的礦業城鎮，被譽為「東亞第一金都」。

水湍洞位於金瓜石北側臨海處，約在九份溪出海口兩岸山坡。日治初期以前此地幾乎罕有人煙，直到1930年代十三層選礦場（又稱水湍洞選礦廠）設立

後，才陸續有礦工及家屬遷入聚居。水湳洞的地名據稱源自於選礦場廣場附近的一處海蝕洞穴；洞旁有溪流自山上流出，沖刷形成泥濘的「湳仔地」（臺語，意為泥濘地），因而稱此地為「水湳洞」。地名反映出該地獨特的地理環境——山水交會處的礦山聚落風貌。水湳洞聚落面朝陰陽海與基隆嶼，背倚金瓜石山，濱海與山城景色交融，也是水金九礦山文化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李光中等人，2020)。

（二）礦業歷史脈絡

興盛時期

水金九地區位於臺灣北部山區，因蘊藏豐富的金、銅礦而成為臺灣礦業史上的重鎮。其礦業開發可追溯至清代；首任諸羅知縣李麒光在《臺灣雜記》

（1684年）中即記載基隆山一帶「土產金」，顯示早期原住民時代已發現山中沙金的蹤跡。19世紀末，臺灣出現了第一次淘金熱：1890年有廣東籍工人在基隆河發現砂金，引發民間爭相赴山區淘金。清政府為整頓礦政，於1892年設立「金砂總局」，實行採金課稅與許可制度；在官方管理下，金礦開採規模逐漸擴大。以下以時間軸列出水金九礦業發展的主要脈絡與興盛史(閻亞寧，2014)：

- **1893–1895 清領末期：**1893年在九份地區發現了金礦脈，隔年又發現形似南瓜的金礦露頭（稱為「小金瓜露頭」），帶動金瓜石礦區聲名大噪。1895年《馬關條約》割臺後，日本接管臺灣，延續清廷政策設置「砂金局」，隨即頒布《臺灣鑛業規則》，劃定基隆山為界分設東西兩大礦區：東部為金瓜石礦山，礦權授予日本田中長兵衛經營的田中組；西部為瑞芳礦山（即九份），礦權授予日本藤田傳三郎的藤田組。此時

期九份以開採脈金為主，因礦脈露頭明顯而多以露天方式採金。1897年起九份礦區陸續擴大開鑛，採金業者雲集。

- **1896–1906 日治初期：**日本統治當局重視金礦資源，引進新式採礦技術。藤田組掌管九份礦區、田中組經營金瓜石礦區的格局確立。1901年時瑞芳、金瓜石、武丹坑三地並稱「基隆三金山」，預示礦脈蘊藏極豐。1906年（明治39年）在金瓜石附近的水南洞（今水湳洞）興建全臺唯一的乾式選礦製煉所，專門冶煉含金銀銅的硫砷銅礦，以提煉銅及附產金銀。這座十三層樓高的選煉廠是當時東亞先進的冶煉設備，象徵著礦業技術的現代化。隔年煉廠完工後，金瓜石開始以乾式法大量冶煉銅礦，銅錠運往日本本土冶煉廠加工。1905年在金瓜石長仁礦床發現大型含金銀硫砷銅礦脈，開採重心從採金擴至採銅。在日本殖產政策推動下，臺灣金礦產量迅速攀升；1914年（日治大正3年）臺灣成為日本帝國境內最大的產金地區。
- **1914–1930 黃金產業鼎盛：**1914年因九份礦區金砂品位下降、藤田組獲利驟減，遂將九份礦業權轉讓給臺灣籍礦商顏雲年經營。顏雲年引入資金以股份制重新振興九份礦區，在1917年成立「田中鑛業株式會社」（企圖擴大經營），又於1920年改組成立臺陽礦業株式會社，統籌經營九份及鄰近平溪、猴硐等地的礦業。此時九份金礦開採技術日益提升，新設施（如礦砂選礦浮選廠）於1939年建成，可日處理600噸礦砂，提高了選礦效率。相對地，金瓜石礦山在1920年代一度因成本高漲、經營不善而縮減冶煉業務，改以開採原礦出售為主，將礦石運至日本佐賀關冶煉廠加工。1925年（金瓜石礦山經營權轉予後宮信太郎）成立金瓜石鑛山株式會社，積極探勘新礦源，終於在金瓜石長仁礦床群找到了更豐富的含金銅礦和高品位金礦體，帶動金瓜石再現採礦高峰。1933年，日本大型礦業財閥日本鑛業株式會社收購金瓜石礦山經營權，成立

「臺灣鑛業株式會社金瓜石事務所」，投入資金更新採選礦設備。1937 年以後，由於戰時需求，金瓜石開始大量開採銅礦支援日本軍需，金礦產量仍居高不下。1938 年金瓜石創下年產貴金屬 2.6 公噸的紀錄，被譽為「亞洲第一貴金屬礦山」。可以說，從日治中期到二戰前夕是九份-金瓜石礦業的極盛時期，山城間礦坑林立、人口劇增，呈現一派繁榮的「黃金山城」景象。

- **1940s 二戰時期：**1941 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臺灣金礦業轉入戰時體制。金瓜石礦場改重點生產銅，以供應軍工需品，同時日軍在當地設立戰俘營（關押大英聯邦籍戰俘），強迫其從事艱苦的地下採礦。由於盟軍空襲與戰局惡化，1944 年金瓜石被迫全面停採，各坑口封閉，礦業生產陷入停頓。至此，水金九地區延續半世紀的黃金採礦榮景劃下休止符。

上述脈絡顯示，水金九地區在清末至日治時期歷經了發軔—興盛—極盛的階段。尤其在日治黃金產業的全盛期，九份與金瓜石產金量一度占據日本帝國之冠。礦業的蓬勃發展帶動人口湧入與都市化，使原本偏遠的山區形成獨特的礦山城鎮。各礦區之間亦分工明確：金瓜石為採礦及選煉中心，水湳洞為冶煉工廠與礦工聚落，九份則發展出商業和娛樂功能，成為礦工下班後休憩消費的場所。採礦經濟的繁榮奠定了水金九地區在臺灣產業史上的重要地位。

沒落時期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水金九地區的礦業進入沒落期。1945 年戰後臺灣政權交替，中華民國政府接收日人礦山資產，著手重建金屬礦業。1946 年經濟部設立「臺灣金銅礦籌備處」，1948 年正式接管金瓜石礦山，由臺灣銀行以

官定價格收購冶煉後的黃金(閻亞寧, 2014)。然而戰後初期因國共內戰導致政局不穩, 通貨膨脹影響下金價低迷, 政府遂推行「以銅養金」的經營模式: 先開採銅礦獲利以維持金礦運作。1955年, 接收自日人的礦業機構改制為臺灣金屬鑛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臺金公司), 延續上述策略經營。儘管國營礦山努力延長礦場壽命, 但因礦石儲量日益枯竭, 加上國際金價持續低迷, 水金九地區的採礦產業終究走向終結。1971年, 臺陽礦業公司因瑞芳(金瓜石、九份)金礦耗竭, 宣布結束採金業務; 1978年金瓜石礦山也因金銅產量降至經營臨界而停產。此後, 臺金公司雖一度轉向冶煉加工進口銅礦砂, 但因經濟結構轉變和市場因素, 仍在1980年代停止了在地的採礦作業。水金九地區延續近百年的採金歷史就此劃下句點, 繁華一時的礦山城鎮迅速沉寂下來。

礦業沒落對地方社會帶來巨大衝擊。首先是人口與經濟的流失: 礦場關閉後, 大量居民, 特別是礦工家庭紛紛遷離他鄉謀生, 使得九份、金瓜石在1970年代之後人口驟減, 昔日的熱鬧市街變得空蕩。留在當地的居民則面臨失業困境和社會轉型的種種挑戰。九份老街店面大多歇業, 學校一度因兒童稀少而面臨裁撤, 整個聚落瀰漫著蕭條沒落的氛圍。正如鄭得興等人(2013)的研究所指出, 九份與金瓜石在停止採礦後, 在地居民集體記憶中充斥著「離散與創痛經驗」。對許多老礦工家庭而言, 礦業的終結意味著生活重心和身份認同的喪失, 地方社會出現一段漫長的低潮期。

然而, 礦業遺留下的文化與景觀價值也在此時開始受到關注。1980年代起, 隨著臺灣整體經濟從工業轉型, 社會上興起了文化保存與地方意識抬頭的浪潮。地方政府與文史工作者逐漸認識到水金九地區殘存的礦業設施和聚落風貌具有珍貴的歷史意義。黃金博物館的成立即是轉捩點之一: 2004年新北市政府將臺金公司在金瓜石的舊址闢建為「黃金博物園區」, 保存礦山設施並規劃礦業史料展覽(蔡宗雄, 2012)。館內復原礦場場景、保存礦工文物, 成為全臺

首座生態博物館型態的地方博物館，讓遊客得以親身體驗礦業文化。此舉不僅保存了珍貴的礦業遺產，也為當地轉型觀光注入契機。隨後數年間，十三層選煉廠遺址、礦坑坑道、日式宿舍群等也陸續被指定為歷史建築或文化景觀予以保留。由沒落轉向新生，水金九地區開始從產業衰退期邁入文化資產保存期。地方社會也逐漸意識到，礦業的結束並非終點，而是轉化為另一種地方價值的開始——礦業遺產成為地方記憶與觀光資源的新核心(李光中等人, 2020)。

觀光興盛與記憶建構之轉變

礦業沒落之後沉寂了約十年的水金九地區，因緣際會在 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逐漸重新煥發生機，踏上觀光興盛之路(吳亞璇等人, 2015)。首先是一部電影喚起了全臺關注，1989 年侯孝賢執導的電影《悲情城市》在九份取景，片中呈現的山城老街與懷舊氛圍令觀眾印象深刻(王萬睿, 2015)。隨著影片在國際上獲獎，九份一夕之間聲名大噪，成為觀光客嚮往的懷舊勝地(王智明, 2023)。1990 年代起，大批國內外遊客湧入九份老街，昔日寧靜的礦區小鎮搖身變為熱門觀光景點。許多閒置已久的老房子被改造為茶樓、餐館和民宿，街道兩旁掛滿紅色燈籠，營造出濃厚的懷舊情調。九份老街以獨特的山城風光與傳統小吃聞名，吸引無數遊客前來體驗昔日礦村風華(林宗賢和李安娜, 2011)。

然而，在觀光熱潮背後，本地居民的集體記憶與生活經驗卻日漸被邊緣化，出現記憶的疏離現象(鄭得興等人, 2013)。研究者指出，今日九份、金瓜石彷彿形成兩個世界：一個是展示給觀光客消費的老街和博物館，另一個則是在地人的日常生活圈。觀光客懷舊的是昔日的採金歲月與浪漫想像，但對在地居民而言，那段歲月包含著艱苦與離散的現實記憶。隨著觀光發展，由政治與商業力量主導的新地方記憶逐漸取代了居民原有的生活記憶，造成在地認同感的

斷裂。曾慈慧等人(2011)的研究亦發現，在礦業遺產觀光中提升真實性，有助於強化遊客的觀光意象、地方感與重遊意願，可見保存原真地方文化對於永續觀光的重要性。目前九份老街的商業經營多由外來資本主導，當地年輕世代因生活成本提高與就業機會有限而大量外流。因此，即便九份、金瓜石每年湧入大量觀光人潮，地方社會卻未必能實質分享觀光所帶來的繁榮成果。政府統計的觀光人次成長固然亮眼，但背後在地居民的生活品質提升與否，仍有賴進一步觀察與平衡。

政府與學界近年也開始反思觀光開發模式，強調在地居民參與與社區營造的重要，避免觀光過度商業化而喪失地方本質(劉靜怡, 2022)。總體而言，水金九地區的觀光興盛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重新喚起了沉睡的山城，保存並傳播了礦業文化；另一方面也帶來了記憶商品化與社會變遷的陣痛。如何在觀光發展與在地記憶間取得平衡，成為地方未來發展必須面對的課題。

地質公園導入與地方創生影響

在觀光蓬勃的同時，水金九地區也積極尋求永續發展與地方創生的新途徑，其中一大方向便是結合地質、生態資源來推動地質公園理念。水金九地區擁有極為獨特且豐富的地質景觀：此區域處於山海交界，地質構造複雜多樣，蘊藏了多種礦物與岩層。新北市政府於 2010 年代開始評估在九份、金瓜石、水湳洞設立地質公園的可行性。黃家俊和紀權官(2021)對此進行了專門研究，從地質學角度評估該區的地質多樣性。不僅能保育珍貴的地質與礦業遺產，也能透過地質旅遊帶動環境教育與社區發展。

實際上，水金九礦業聚落遂被列入臺灣潛力世界遺產名單(2003 年入選)，成為政府主打的文化觀光品牌。雖然目前尚未正式申遺成功，但在此過

程中，相關單位已投入大量資源進行調查研究、環境整備與社區溝通(張家銘 & 施富盛, 2013)。2019 年，臺電公司更攜手藝術團隊實施「點亮十三層」計畫，以燈光公共藝術活化水湳洞十三層選煉廠遺址，再現昔日礦山夜景(Chen, 2022)。該裝置點燈後的壯觀美景成為新的打卡熱點，成功結合地質遺跡保存與觀光創意。

從地方創生的觀點看，引入地質公園理念對水金九地區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首先，在環境保育上，地質公園強調地質遺產的保存，促使政府更加重視礦業遺址、生態環境的維護，防止過度商業開發對自然、人文景觀的破壞(王文誠, 2016)。例如，陰陽海、燭台雙嶼、金瓜石神社遺址等具地質或文化意義的景點，都因地質公園規劃而獲得更完善的保護與解說設施。第二，在社區經濟上，地質公園帶動了地質旅遊(geo-tourism)的新風潮，吸引對地質、生態有興趣的遊客深入體驗當地特色。這種旅遊模式偏好小規模、深度導覽，有助於延長遊客停留時間並分散消費，使收益更能回饋在地小型業者。地方民宿和導覽員也開始結合地景知識，提供如礦山生態步道導覽、地質尋寶等創新體驗，豐富觀光內涵(洪迺鈞等人, 2015)。第三，在治理模式上，地質公園的推動講求協作治理：中央與地方政府、社區組織、專家學者共同參與規劃與管理(劉靜怡, 2022)。水金九地區在朝向地質公園的過程中，亦成立了在地解說協會、礦山社區發展協會等組織，讓居民有機會參與決策，培養在地主人意識。這種從下而上的地方創生策略，有助於避免過去觀光發展由外力主導、在地被邊緣化的情形，再度發生。最後，在文化傳承上，地質公園框架鼓勵地方將自然與人文資產統整敘事，強化居民對家鄉的認同感。楊佳瑋(2015)強調，要保存水金九地區的礦業文化資產，需從空間分布、社區參與等多面向擬定策略，以確保文化景觀的整體性與延續性。這與地質公園的理念不謀而合：強調土地與人的關係，追求經濟、文化、生態的共榮。

總結而言，地質公園的導入為水金九地區的永續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願景。從礦業遺產的保存、環境教育的推廣，到社區經濟的創新、地方意識的提升，皆展現了正面的影響。雖然目前水金九地區仍在朝世界級地質公園和文化景觀區邁進，過程中亦面臨資源整合、社區溝通等挑戰，但可以肯定的是：經由地質公園與地方創生的雙軌並進，昔日的「黃金山城」正逐步轉型為今日的「環境黃金」——一座既保有歷史記憶又充滿生命力的山海小城。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取向，以深度訪談為主要方法，探討水金九地區在導入地質公園後居民地方認同感的時空動態變化。首先，本研究鎖定研究目的與問題，繼而進行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形成研究架構。隨後確立以質性方法進行資料蒐集，最後對資料進行分析與討論，歸納研究結論並提出建議。

研究目的在於理解地質公園導入對水金九地區居民地方認同感的影響及其演變。本研究聚焦下列幾項核心問題與目標：

1. 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地方認同感：認識水金九地區居民在不同時期與情境中的地方認同感特徵。
2. 地質公園導入後的認同變化：探討導入地質公園概念後，居民地方認同感是否有所提升或轉變。這涵蓋地質公園帶來的環境保育、社區發展等變革，是否強化了居民對家鄉的歸屬感和自豪感。
3. 地方認同感的影響因素：識別除地質公園外，其他可能影響地方認同感的因素。

為實現上述目標，本研究以水金九地區的在地居民為主要研究對象，同時納入地質公園相關參與者。居民部分涵蓋九份、金瓜石、水湳洞的居民，以確保資料來源的多元性。而地質公園參與者則包括在地質公園推動過程中扮演關鍵角色的成員。這些對象不一定土生土長於水金九，但因地質公園計畫而匯聚於此，能提供外來專業視角與在地互動經驗。

本研究透過質性深度訪談來蒐集資料。深度訪談方面，針對不同類別的受訪者進行一對一半結構式訪談，深入了解個人對地方認同的敘事與觀點，包括對

家鄉的情感、記憶，以及對地質公園的看法等。訪綱設計納入地質公園認知，如居民是否瞭解地質公園，對於地方居民的看法為何及認為會影響不同時期居民地方認同感的因素，以及如何影響對家鄉的情感連結。此方法將地質素養與情感並列於地方認同分析中，補足了地方認同的分析架構與理解維度。以下為本研究的訪綱內容：

1. 您對於地質公園的認知是什麼？
2. 您什麼時候開始接觸地質公園，為什麼會選擇水金九地質公園而不是其選擇呢？
3. 您在地質公園推廣中擔任重要的角色？您具備那一些技能？
4. 您對於在地居民的理解是什麼，您是否覺得自己是在地居民？
5. 您認為了解地質公園會增加當地居民的地方認同嗎？為什麼？
6. 您對於水金九不同時代背景下，居民對於地方認同感有什麼變化嗎？
7. 您覺得那些因素會影響地方認同感？
8. 您為什麼會選擇待在水金九/來這邊工作？是什麼原因讓您留下來或過來這邊呢？
9. 對於加入地質公園協會您有什麼看法？是否對現在地質公園推廣有什麼不一樣嗎？

資料蒐集完成後，將錄音逐字稿進行整理與編碼，採用主題分析法歸納出重複出現的主題與意義模式。分析時遵循質性研究的歸納推論路徑，從訪談內容中抽取居民地方認同感的關鍵元素，比較地質公園導入前後相關內涵的轉變。綜合各項主題的關聯，建構水金九地區地方認同感隨時空變遷的敘事，全盤回應研究問題。本節所建立的研究架構，從目的、問題出發，經由對象與方法的設計，銜接至資料分析，為後續結果討論奠定了明確的基礎。

第二節 質性研究之意涵

質性研究植基於詮釋學取向的哲學觀點，強調主觀詮釋與情境脈絡的重要性(潘慧玲，2003)。相較於強調客觀實證的量化範式，質性研究的本體論假設更接近相對主義立場，認為現實並非單一不變的真理，而是隨歷史、文化、地域和個人經驗等情境因素而改變的。換言之，不同社會文化背景下會產生多樣的現實圖像；研究者關注的是情境中人們如何賦予經驗以意義，而非尋找普世不變的因果法則。在認識論上，質性取向強調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互動關係，知識是雙方共同建構的結果(黃瑞琴，2021)。研究者承認自身的價值立場和詮釋將影響研究過程，並透過反思降低偏見，以貼近受訪者眼中的世界。這種哲學立場使質性研究特別適合探索社會現象背後深層的意涵，強調理解勝於解釋，脈絡重於普遍。

質性研究在方法論上有別於量化研究的統計取向，具有以下幾項關鍵特徵(黃瑞琴，2021)：

- 情境脈絡性：質性研究強調在自然情境中收集資料，注重現象發生的社會文化脈絡。研究者往往深入田野，以觀察、訪談等方式貼近研究對象的真實生活環境，獲取「脈絡化」的第一手資料。這種方法使我們得以理解行為與經驗如何嵌入於特定脈絡之中，而非割裂地看待資料。
- 主觀詮釋性：質性資料多以文字、影像等非數值形式呈現，透過研究者的詮釋賦予意義。研究者本身即為資料蒐集與分析的主要工具，研究者需對訪談對話、觀察筆記等進行編碼、分類和主題歸納。在此過程中，研究者的洞察力與反思能力至關重要。質性分析通常採取歸納法，由大量具體資料中抽象出概念與模式，形成理論或結論。
- 彈性探索性：質性研究設計具有彈性，研究問題可隨資料蒐集過程逐漸聚焦或修正。與預先假設明確變項關係的量化研究不同，質性研究允許

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新想法並調整方向。此特性鼓勵研究者擁抱研究現場的複雜性與不可預期性，以開放態度探索資料所透露的意義。

- 深度與多樣性：質性研究通常以少量個案為對象，但深入蒐集每個個案的豐富資訊。透過詳細訪談和長時間觀察，質性研究能深入呈現單一個案或小群體的真实故事和細節。雖然樣本規模不大，但厚實的資料能提供其他方法難以取得的獨特洞見。此外，質性研究鼓勵多元資料來源（訪談、文件、觀察等）的運用，以從多角度拼組現象的全貌。

以上特徵使質性研究在解讀人類行為和社會現象時，能夠聚焦「如何」與「為什麼」的問題。質性取向追求的是對人們賦予意義之過程的理解，而非僅僅量測「發生了什麼及其頻率」。例如，在質性框架中，我們關心居民為何會產生某種地方情感、如何敘說家鄉故事，這與量化研究透過問卷評量「認同感強度有多高」形成了互補的對照。

質性研究特別適用於探討深入社會文化脈絡中的議題，包括地方認同感在內的主觀經驗與意義建構(潘淑滿, 2022)。地方認同感涉及居民與其所處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身份連結與符號意義，是一種複雜且多層次的社會心理現象。由於地方認同牽涉歷史記憶、文化敘事與社區互動等面向，其內涵難以以單一數值量表加以衡量。質性方法能在研究中融入在地的歷史與文化脈絡，透過受訪者的敘事理解他們如何看待家園、詮釋地方意義。

在社會文化研究中，質性方法提供「局內人」(insider)視角。研究者透過與參與者的對話與互動，試圖站在當事人角度理解其所處情境下的想法與感受(張芬芬, 2021)。這種從下而上蒐集在地知識的方法，有助於揭示隱含於居民經驗中的文化符號和價值觀。

此外，質性取向允許研究者將這些多樣聲音納入分析範圍，並尊重每種觀點在其脈絡中皆有其合理性(黃瑞琴，2021)。相較之下，量化研究往往聚焦於整體趨勢與共性，而質性研究能深入理解少數族群或特殊個案，挖掘一般統計所掩蓋的獨特故事(萬文隆，2004)。對於地方認同這類深受文化脈絡影響的議題，質性研究不僅提供了理解「人與地方」關係的厚實描述，也能連結微觀經驗與宏觀社會文化現象，帶來更全面的詮釋。

總而言之，質性研究以其獨特的哲學立場和方法論特徵，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了強調意義和脈絡的視角。其在地方認同等議題上的運用，使我們能更貼近地理解人們在所在地中構築身份與歸屬的細緻過程，補充了傳統量化研究在該領域的不足，深化了對人地關係的體察。



第三節 採用質性研究之理由

本研究結合上述主題背景與方法論考量，選擇質性研究作為主要研究取徑，其原因如下：

1. 捕捉在地知識與脈絡細節：水金九地區具有獨特的歷史與社會脈絡——從日治時期的礦業興盛、礦產衰退後的沒落，到近年觀光復甦及地質公園理念的導入。居民的地方認同感深受這些脈絡變遷影響，許多內隱的在地知識與集體記憶難以透過制式問卷量化捕捉。質性深度訪談允許居民以自己的語言敘述地方故事，分享對家鄉變遷的觀感與情感。
2. 彰顯多元聲音與主體經驗：地方認同感並非整齊劃一，全體居民可能因世代、身份、參與程度不同而對地質公園持各異的態度與認同程度。本研究透過多位受訪者的質性資料，得以呈現多元觀點。相較之下，量化問卷雖可統計大多數人的看法，卻可能掩蓋少數族群的獨特意見。質性方法強調「揭示多元觀點」而非簡化為二元答案，這在探索地方認同此類複雜議題時尤為關鍵。
3. 發掘情感與歷史脈絡下的深層意涵：地方認同感包含強烈的情感因素與歷史延續性，質性研究在捕捉這些面向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優勢。透過深入訪談，本研究能了解居民對家鄉的情感依戀如何形成，以及地質公園的出現如何觸發身份認同的變化。質性研究能探索因果背後的意義脈絡。余明仁和張訓（2018）的質性研究指出，外地移居者先產生情感依附，繼而建立地方認同，進而主動投入社區。這種「情感先於認同、認同引發行動」的過程，正是質性取向才能揭露的深層意涵，說明地方認同的培養並非一蹴可幾，而是一段隨經驗累積的生命故事。
4. 相對於量化研究的適切性：量化研究在處理大型樣本和測量強度上有其長處，但對於需要理解複雜社會現象的研究問題，可能顯得力有未逮。本研究議

題著重「如何」與「為什麼」——如地質公園如何影響居民認同、為什麼不同群體反應有別——這類問題更適合以質性路徑回答。量化問卷雖能告訴我們「多少比例的居民認同地質公園」，卻無法詳述「認同從何而來、經歷了哪些轉折」。質性研究則能彌補此不足，提供機制性的解釋和脈絡化的理解。此外，在一個僅三千多人口的小型社區（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合計約 3,538 人）中，量化調查樣本數有限可能影響統計推論力，而質性研究無此限制，反而可藉由精選資訊豐富的個案深入挖掘。質性與量化並非截然對立，而是各有所長。然而考量本研究主題強調地方經驗的獨特性與脈絡性，質性研究相對更能提供貼切而深入的洞見。

5. 有助後續實務與政策意涵：最後，採用質性方法的成果，不僅在學理上豐富對地方認同的詮釋，也對實務發展具有啟示。透過傾聽居民心聲，我們得以理解地質公園政策在地落實的真實感受與困難，這為後續政策調整提供依據。例如，若訪談發現部分居民對地質公園缺乏認識或參與感，政府單位即可據此強化社區宣導與參與機制，增進公眾對地質公園的認同與支持。質性研究產生的豐富敘事，也能為地方創生及社區營造提供真實案例和經驗教訓。因此，選擇質性取徑不僅是為了回答研究問題，更是為了讓研究結果更貼近在地現實，真正反映居民的想法，進而轉化為具體可行的建議。

綜上所述，本研究採用質性研究乃基於對研究主題性質的審慎考量，以下表二為本研究受訪者的編號與資訊。質性方法能全面呈現水金九地區居民地方認同感在地質公園導入前後的細緻變化，讓研究者以局內人視角體會此一演變過程。相對於量化資料的冰冷數字，質性資料中的人情味與故事性賦予了研究更深刻的內涵。這種以人為本的研究取徑，使我們有機會發現隱含在數據背後的故事，聆聽那些統計百分比中沉默的聲音，從而對「地方認同」這一人地關係核心議題有更豐富而立體的理解。藉由質性研究之採用，我們確保了本研究

能緊扣社會文化脈絡，忠實反映水金九居民的所思所感，為地質公園與地方社區的協調發展提供寶貴的知識基礎與決策參考。

以下為受訪者背景介紹：

受訪者 A1：男性，金瓜石人，年輕時在台北工作，退休後仍居住於台北，但經常返回水金九地區。他熱愛攝影，習慣用相機記錄對水金九地區的記憶，目前積極推廣水金九地質公園，擔任地質公園解說員。

受訪者 A2：男性，道地的金瓜石人，年輕時曾赴台北就讀大學，退休後返回水金九地區，過著退休生活，是一位對當地歷史與環境非常熟悉的在地人。

受訪者 A3：男性，金瓜石人，年輕時在桃園的國際企業任職，退休後回到金瓜石。目前在黃金博物館任職，同時也積極參與水金九地質公園推廣活動，擔任解說員。

受訪者 A4：男性，桃園人，因工作被派至黃金博物館，逐漸對當地產生情感與認同。雖非前線解說人員，但在地質公園的推廣工作中扮演幕後重要角色。

受訪者 A5：女性，基隆人，目前從事英文家教，工作時間較自由。因結識 A9 後，對水金九地區的歷史產生興趣，現與 A9 共同經營「美代子理髮廳」。

受訪者 A6：女性，九份人，在九份老街經營店面，並積極協助福山宮廟務，是該廟重要的管理人員之一。

受訪者 A7：男性，彰化人，年輕時被派至瑞芳工作，成家後定居汐止。對地質公園興趣濃厚，逐漸培養出對水金九地區的情感。他亦於福山宮協助廟務，計畫退休後正式成為廟公。

受訪者 A8：男性，金瓜石人，年輕時赴台北發展並長期定居台北，退休後返鄉，將舊家改建為故事館，以推廣水金九地區歷史。

受訪者 A9：女性，九份人，年輕時於台北求學，祖父過世後接管其九份的博物館，隨後將九份最後一家理髮廳「美代子」轉型為展覽空間，並偶與 A6 合作舉辦市集活動，廣受好評。

受訪者 A10：女性，瑞芳人，婚後至九份開設陶瓷店，自行製作店內大部分陶瓷商品。熱愛自然，閒暇時常與朋友於九份地區登山健行。

受訪者 A11：男性，九份人，年輕時赴台北市任職警察，退休後返回九份照顧年邁雙親。現與妻子經營素食餐廳，開店目的在於推廣素食理念，而非以營利為主要考量。



表二：受訪者編號及基本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每月個人所得	訪談日期	訪談地點
A1	男	65 以上	27000 以下	2025/1/9	勸濟堂
A2	男	65 以上	27000 以下	2025/1/9	勸濟堂
A3	男	65 以上	35001-47000	2025/1/9	勸濟堂
A4	男	26-35	47001-59000	2025/1/9	勸濟堂
A5	女	26-35	47001-59000	2025/1/9	美代子理髮廳
A6	女	46-55	59000-100000	2025/1/15	福山宮
A7	男	46-55	59000-100000	2025/1/15	福山宮
A8	男	56-65	27000 以下	2025/1/16	金瓜石天公仔囡故事館
A9	女	36-45	27001-35000	2025/1/16	美代子理髮廳
A10	女	56-65	27001-35000	2025/1/16	藏花小集
A11	男	46-55	27001-35000	2025/5/23	慈鴻素食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將針對訪談所獲得的資料進行分析，並結合地質公園發展的脈絡來探討水金九地區居民的地方認同。為使分析條理分明，討論內容劃分為六個主題部分。首先，「地方認同感」將探討當地居民對其居住地所產生的情感連結與身份認同，說明居民如何看待自己與這片土地的關係。其次，「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地方認同感」著重比較不同歷史時期與空間背景下地方認同感的異同，強調在不同社會脈絡中居民地方認同的變遷與差異。第三，「認同的建立在經濟地理的基礎上」透過經濟地理的角度詮釋如何以經濟的角度影響地方認同感。第四，「地質公園對地方認同感的影響」將分析水金九地質公園的設立與相關活動對居民地方認同感所產生的影響，探討地質公園如何塑造或改變居民的地方情感與歸屬。透過上述四個主題的分析引導，本章將清晰展現水金九地質公園與地方認同之間的互動關係，為後續章節的討論與結論奠定基礎。

第一節 地方認同感

本研究主要以水金九地質公園的環境素養探討當地居民的地方認同感，而地方認同感視為一種對土地與社群的「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強調心理上的認同勝於戶籍血緣等形式因素。另外，「共同經歷與環境因素」往往也會影響這地方認同感。地方認同感也表現在「社區付出與參與度」的意願。當然，現在的交通便利，人們的流通性的比以前高，最後我們也會透過「外地人的地方認同」去看待不同群體的認同感。透過對受訪者進行地方認同感的訪談之後，本研究將此一部分訪談結果主要歸納為四個部分。

「地方認同感」指人們對居住地方所產生的情感連結與身分認同。在地理學者(Relph, 1976)的觀點中，地方是人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意義空間，深入體驗地方可產生「存在的地方感」；相反地，缺乏歸屬則導致「無地性」。段義孚

段義孚等人(2018)提出「戀地情結」(topophilia)的概念，將人對地方的深厚情感形容為一種愛戀關係，即人與環境之間的情感依附。Agnew (1987)進一步將「地方感」界定為集體身分的一部分，認為人的自我認同包含對特定地方的歸屬，地方因獨特特質而成為集體認同的重要來源。簡言之，地方認同感涵括居民對地方的情感依賴、歸屬感以及由此產生的自我定位。

一、情感連結與歸屬感

「感情」的建立非常的微妙，它是需要長期相處並且深入探討之後才會產生的要素。人們對於一個地方產生深厚的認同，往往來自於長期生活、工作以及人際互動中逐漸累積的情感記憶。當人們與特定地區建立起情感連結時，該地便不再僅僅是一個物理上的空間，更成為一種心靈的歸屬所在。其中認為情感連結與歸屬感會構成地方認同感的受訪者分享如下：

「飲水思源...我們的家鄉愛，一個這麼特殊的一個地方。」(A2:1)

「這就是我的家鄉，我退休就回來這裡就回來這裡也是地方連結情感」(A3:3)

「我現在已經退休了，我想回來把家鄉的情撿回來再把它重拾起來。」(A8:4)

「我在地方社團發現大家都會說我的家鄉真漂亮！」(A9:4)

這種認同感可能來自於家鄉的熟悉感，例如童年時常遊玩的街道、與朋友共同經歷的回憶，甚至是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鄰里互助所帶來的溫暖與安全感。當人們遠離這些地方時，往往會因為內心強烈的情感連結，而產生一種懷念或渴望回歸的情緒。因此，情感連結不僅促使人們產生地方認同，更提供了一種心理上的支持與歸屬感，讓個人在面對生活變動與挑戰時，能夠擁有堅定的精神依靠，並從這樣的情感基礎中汲取力量與安定感。

經由上述受訪者的論述，我們可以深刻體會到情感上的連結對於地方認同感的強大影響力。正是這份深厚的情感，促使人們即使因為工作、求學或其他個人

生涯規劃等因素暫時離開，內心卻始終保留著對家鄉難以割捨的情懷與眷戀。無論經歷多少歲月的變遷，最終人們仍然渴望回歸自己心靈的故鄉，重新拾起與這片土地之間的珍貴回憶，並延續那些曾經共同經歷的情感與故事。

這種深刻的情感連結不僅成為個人歸屬感的重要來源，也逐漸形成社區之間互信互助的堅實基礎，讓居民更加積極地參與地方事務，共同推動社區的發展與進步。地方認同感也因此成為凝聚社區活力的重要核心力量，激發人們不斷地將這份美好、喜悅與自豪感持續傳遞，為地方的未來創造更多豐富且動人的故事。

二、共同經歷與環境因素

地方認同感也深受當地文化、傳統與集體記憶所影響。當人們共同經歷重要的社區事件或文化活動，如節慶慶典、地方祭典，或共同面對重大事件的挑戰時，這些共同的經驗往往能深化彼此的情感連結，促進群體之間更緊密的心理聯繫。這種集體經驗會進一步加深人們對地方的情感認同，促使他們在心靈上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其中 3 位受訪者表示：

「情感是在的每個人對這種土地的認同其實是有的。」（A1:3）

「我願意在我把金瓜石我的成長過程當中看到了然後印象深刻的在導覽的過程當中跟大家來分享」（A8:6）

「一起做就會有一起的經驗，一起的經驗就會有群體的形成，他才有...驕傲感」（A9:6）

人們在共同參與與經歷中建立了對土地的認同感與自豪感，這種情感不僅存在於個人心中，更是成為凝聚整個社區的重要力量。透過彼此交流和分享過去的成長經歷、地方的故事及文化特色，個人的記憶逐漸形成了集體的回憶與歸屬感。此外，透過共同合作所形成的群體經驗，能進一步凝聚人們的認同與自豪，促使他們積極投入地方事務，進而強化了社區的團結與凝聚力，為地方未來的發展奠定了深厚的情感基礎。

三、社區付出與參與度

社區付出與居民的參與度，對於地方認同感的提升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當居民願意主動積極投入地方建設、社區活動及志願服務等各種公益行動時，不僅能直接促進社區的繁榮與發展，更能有效強化居民之間的情感聯繫，形成牢固的共同體意識，進一步提升對地方的認同與歸屬感。其中 5 位受訪者表示：

「地方廟當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它也是地方的意見領袖聚集的地方，」（A1:1）

「這個就是要透過一些活動還是有設立一些特定的據點。」（A1:1）

「來這邊不是說搞富有，而是說可以服務社區的一個願景。」（A2:1）

「我覺得一定要透過活動跟在地社區的連結...」（A5:1）

「我也覺得這個地方就是很特別，我也會願意付出努力去為這個地方更好。」（A5:3）

「我們要對社區的這個生態保護，歷史文物的探索，環境的維護...」（A7:2）

「跟我太太就寫一些家鄉故事，出版那些東西跟社區合作。」（A8:8）

「朋友要是說有說想要辦個活動啊，要聚餐啊幹嘛，就來我們九份。」（A10:2）

在積極參與社區活動的過程中，居民間會逐漸建立起深厚的人際關係與緊密的合作情誼，彼此之間不僅能共享生活經驗與技能，也能在互助過程中深化彼此的理解與支持，逐步形成共同的價值觀與使命感。這樣的參與與付出，更進一步激發了居民對自己所生活之社區的自豪感，並且讓人們對社區未來的發展產生更多期許與使命感。社區的參與不僅限於日常生活中舉辦的活動與志願服務，也包含對社區公共議題的關心與參與。當居民能積極參與公共討論、提出建議與共同規劃未來時，這種民主參與的經驗能進一步提高居民的責任感與主人翁意識。居民們因此更加願意為地方投入心力，主動參與各項社區改善計畫，推動更多正面的社區發展。

透過持續鼓勵並提供機會，讓更多居民能夠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與志工服務，不僅有助於社區整體凝聚力的持續增強，也能提升居民間的信任與團隊合作精神。在這之中，地方廟宇常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僅是居民集會的重要據點，更成為地方意見領袖與社區菁英匯聚、交流及共同討論公共事務的重要場所，促進地方意識的凝聚。隨著參與度的提升，社區將能夠充分發揮潛力，共同打造一個充滿活力、幸福感與自豪感的理想生活環境，進而吸引更多居民持續投入與付出。

四、外地人的地方認同

外地人對地方的認同感，通常是在長期生活、逐步接觸並深入了解當地居民、文化及環境之後，才逐漸形成的情感連結。儘管當地居民的熱情與接納對融入當地社會有所幫助，但更重要的因素往往是外地人透過自身長時間的體驗、觀察以及互動後，逐漸建立起對該地區的深入理解與認同，最終形成穩固的情感歸屬感。其中兩位受訪者認為他們外地人，但他們對於水金九有著濃厚的情感及地方認同感。例如：

「情感上面的認同，然後甚至你都在這邊租房子，住在這個地方。」
(A4:4)

「因為工作需要或者是商業需要，我比較屬於...情感方面的連結。」
(A7:6)

隨著外地人逐步參與當地的文化活動、節慶、以及社區事務，他們不僅能更加深入地理解並尊重當地的傳統與價值觀，也逐漸將自身視為社區的一部分，進一步培養對地方的情感與認同。這種外地人與當地居民之間的積極互動，不僅能豐富社區的文化多樣性，也促進了社區的整體融合與和諧。透過鼓勵更多外地居民積極參與社區生活，社區不僅能提升整體的包容性與多元性，也能促進地方發展的創新動力，並進一步鞏固所有居民共同擁有的地方認同感。

綜合上述訪談與討論，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地方認同感是一種深植於居民內心的情感與認同，是個人與群體經由長期互動與共同經驗所逐漸建立起來的。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共同經歷與環境因素、社區付出與參與度，以及外地人的地

方認同，這四個面向共同交織、相輔相成，形塑並強化居民對於水金九地區的情感與歸屬。

地方認同感不僅提供了個人面對生活變動時的心理支持與精神依靠，更形成了社區凝聚力與發展的基礎。透過居民主動投入社區建設與公共事務，不斷深化地方認同感，居民間的互動與合作更加密切，也激發了對地方未來發展的積極期望與共同使命感。此外，外地人透過長期互動與深入了解，同樣能夠產生強烈的地方認同，促進地方多元融合與和諧。

因此，持續推動地方文化傳承、增加社區參與機會，以及鼓勵不同背景人士的積極融入，將有助於進一步鞏固地方認同感，推動水金九地區未來永續、共融與創新發展，讓這片土地成為居民共同珍惜並引以為傲的心靈家園。



第二節 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地方認同感

地方認同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代變遷和地方發展階段而起伏轉變。水金九地區的居民對地方的情感聯繫，深受礦業興衰、人口流動與觀光發展等歷史脈絡影響。在本研究的深度訪談中，將不同世代的水金九地區透過受訪者回顧各個時期的樣貌分成「礦業興盛時期」、「礦業衰退時期」、「觀光興起時期」及「地質公園時期」，勾勒出地方認同感隨時空轉換的變化歷程。

礦業興盛時期：礦山榮光與地方自豪

日治時期至戰後初期，水金九地區因豐富的金礦資源而繁榮一時，迅速崛起為臺灣知名的礦業重鎮，吸引了來自各地的大量人口移居此地謀生。在金瓜石、九份、水湳洞發現大量金礦後，資本迅速湧入，空間隨之劇烈轉型。昔日偏僻山城瞬間成為礦業重鎮。大量礦工及其家庭湧入，社區人口激增，九份一度有「小上海」之稱，夜晚燈紅酒綠、熱鬧非凡（A11, 7）。當地居民多以採礦為主要職業，這使得當地經濟狀況明顯優於周邊以農業為主的地區，逐漸形成了獨特且令人自豪的「礦山文化」。在這個特殊的社會氛圍下，居民對自己的礦工身份充滿了自豪與尊嚴。

A8 受訪者生動地回憶起年輕時期的情景，他表示，當年他外出求學，只要提到自己來自金瓜石，立即便會吸引周遭人的好奇與敬佩，旁人總會驚嘆：「哇！礦山！你們祖先不是都挖礦石的嗎？我們是礦山出來的自豪。」這種外界的認可與讚賞不僅使居民們產生了強烈的身份認同，更增強了整個社區的凝聚力。（A8:3）

在礦業繁榮的鼎盛時期，九份和金瓜石每天都呈現一片熱鬧繁華的景象，街道擠滿了前來謀生與觀光的人潮。餐廳、戲院、商店等各類商業活動由於礦工而蓬勃發展，日常生活充滿著活力與生機。但九份與金瓜石這兩個聚落還是能察覺出不一樣的繁榮顯現。

九份的金礦是基隆山帶來的，岩漿是由金瓜石方向流往九份。金瓜石的岩漿溫度比較高，流到九份的時候溫度已經比較低了，所以這導致黃金凝結的程度有

所差異。在金瓜石會相對比較容易找到大量的黃金，九份的黃金則比較分散。這樣一來兩者的經營制度就會有所不同(A5:4)。早期九份礦區是由台陽公司接管，金瓜石最早是由台糖承接。從日據時代到國民政府時候他就是兩個日本的會社所以他分別承接給兩個單位(藤田合名會社和金瓜石礦山株式會社)，一個是台陽去接，一個就是國民政府來的時候台金公司(台灣金屬礦業公司)承接延伸(A7:2)。由於九份礦山及金瓜石礦山的經營制度有所不同，也造就了不同的地方色彩。

九份是由台陽公司承接，由於九份礦區的金礦較為分散，因此台陽公司提出了三級承包制度對外進行承包並且獲得的利潤與承包人七三份。三及承包可分為大、中、小三級，大包為台陽公司；中包為各個小型承租公司，他們需要具備有一定的金錢能力承租其中一個礦坑；而小包則是承租小型公司已開挖的隧道進行開採(A9:9)。這個制度吸引了非常多希望可以靠礦業翻身致富的年輕人到此打拼。礦業時代的礦工屬於高危險職業，他們很清楚知道自己可能明天發生一個意外就走了，因此他們相對比較不會有存錢的概念。他們就比較願意花錢，如果有一群很有錢的人而且很願意花錢這個時候就會有很強的消費力(A5:5)。

而金瓜石礦區由台金公司承接，而台金公司為政府企業，工資相對穩定。因此許多家庭藉由礦業的收入而迅速致富，這也使得當地居民有更多的資源投入到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品質的提升，進一步提高了整體社區的生活水準與社會地位。這兩個礦區不僅見證了當年礦業蓬勃發展的榮景，也深刻影響了地方文化及居民的身份認同。即使數十年後，當地居民仍對礦業時代的輝煌記憶猶新，並視之為地方認同的重要根源。昔日的礦坑、巷道與礦工故事，早已超越單純的經濟活動，成為社區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榮耀。這段礦山歷史，持續激發居民對家鄉的情感連結，提醒後世珍惜並傳承這份特殊的地方榮光。這種源自共同勞動與生活經驗的認同，符合 Relph (1976)對「地方」的定義——人們透過日常體驗賦予所在地獨特意義，進而產生歸屬感。然而，Harvey 的空間生產理，資本的湧入往往伴隨空間的不均衡發展(Harvey, 2018)。水金九在礦業時代雖繁榮，實則暗藏社會階層分化與勞資衝突；地方認同感中也潛藏著負面的成分。

除了正向的回應，還是有受訪者帶著反方的看法。由於礦業榮景背後的剝削與苦難，同樣深刻地影響居民對地方的情感。隨著金礦開採，一批批年輕男性投入險惡的坑道作業，許多人英年早逝。A11 受訪者直言過去並無所謂「自豪感」：礦工普遍在 50 歲前因矽肺症離世，九份甚至一度被稱為「寡婦村」，遍佈失去丈夫的婦女（A11:7）。他進一步指出，礦工生命短暫促使揮霍風氣盛行，昔日繁華其實是建立在礦工自暴自棄、及時行樂的悲哀基礎上（A11:7）。此外，礦場制度極為嚴苛，礦主為防工人偷帶金礦，竟對下班礦工進行全身檢查，連隱私部位也不放過。這種缺乏尊嚴的對待，使早期許多礦工心中滋生出對資本權力的不滿與被剝削感。

A11 受訪者強調：「以前這些工人多可悲你知道嗎？一個工人進去採礦，他怕你工人夾帶夾帶有金塊的東西，連屁股都要檢查啊。是很沒有人性的，而且沒有自尊的，我問你這會自豪嗎？」。可見，在礦業時代居民的地方認同中，除了對土地的眷戀與群體情誼，也夾雜著對礦業體制的怨懟和痛苦記憶。正如 Harvey 所述，資本逐利造成的空間壓迫常導致底層勞動者的權益受損，進而影響其對地方的感知與態度(Harvey, 2006)。由於礦業繁榮帶來的利益分配極不公平——「有挖到礦、賺到錢的都早已離開，留下的多是貧苦工人」（A11:1）——地方社會呈現嚴重的階層分化，這也削弱了一部分居民對地方的正面認同。總體而言，礦業時代的水金九，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感一方面體現在礦山共同體的榮耀與團結，另一方面也因資本剝削與生命代價而蒙上陰影。

礦業衰退時期：沒落、離散與認同沉寂

礦產終究屬於有限的自然資源，隨著 1980 年代末礦脈的逐漸耗盡，水金九地區迅速步入了沒落的階段。曾經熙熙攘攘的繁華街區開始變得冷清，人口快速外移，留下來的多為老弱婦孺。

A1 受訪者提起：「年輕的時候因為這個剛好民國 76 年台金公司這裡國營單位收了，這裡就沒有就業機會。我們也剛畢業就被迫我們這裡沒機會就被迫要到別的縣市去工作。」（A3:3）

A6 受訪者回憶起她童年的九份情景：「早上街上幾乎都沒有人，只剩下老人跟小孩，因為年輕人都為了生計而離開這個地方了。」當地商鋪因缺乏客源而紛紛關閉，昔日繁榮的街區逐漸變成門戶緊閉的冷清空間。（A6:2）

這種嚴重的人口外流導致原本緊密的社區網絡逐漸瓦解，居民之間的聯繫越來越少，地方認同感也因此迅速沉寂。然而，儘管面對嚴峻的現實環境，許多離鄉背井的居民並未完全切斷與家鄉的情感連結。A3 受訪者指出：「很多老鄉的心一直還留在金瓜石，即便經濟條件無法允許他們回鄉定居，他們內心深處仍舊時刻牽掛著故土」（A3:2）。A1 受訪者也觀察到，若家鄉還存有房屋、土地或親戚，返鄉的頻率便明顯提高，這種物質上的連結往往伴隨著強烈的情感依附（A1:3）。

這種隱藏於內心深處的鄉愁與眷戀，即使在現實生活的艱難與疏離中，仍然悄悄地影響著許多人的內心世界。許多居民偶爾回到故鄉時，透過重遊舊地、參與廟會或地方節慶等活動，希望重新感受並喚醒昔日的榮耀與情感歸屬。這種深刻而持久的情感連結，儘管短期內無法立刻恢復地方的活力，但卻成為日後地方認同重新凝聚與復甦的重要情感基礎。許多留守者在心理上接受了九份「沒落山城」的現實定位，對於地方不再抱持驕傲，而更多是無奈與感傷。這也符合 Relph 所說的“地方疏離”現象，當地方環境巨變且喪失原有功能時，居住者可能對其逐漸失去認同，甚至出現「無地方感」（Relph, 1976）。

觀光興起時期：復甦與商業化下的認同轉型

1990 年代起，隨著電影《悲情城市》取景九份造成轟動，水金九地區迎來新一波發展契機——觀光旅遊業的興起。昔日冷清的山城因懷舊風情吸引大量遊客，老街商圈逐漸復甦，地方經濟再次繁榮。然而，觀光業的快速發展對地方社會與認同感既帶來正面效益，也伴隨新的矛盾和挑戰。

一方面，觀光熱潮讓居民對家鄉有了新的驕傲資本。九份老街成為國內外聞名的觀光勝地，地方知名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轉化為居民的自豪感。不少年輕

一輩選擇返鄉從事旅遊相關產業，例如開設茶坊、民宿或經營博物館，以家鄉文化為榮，創造自己的事業。

A9 受訪者就表示，起初是因家族情感衝動接手博物館，但投入後深覺九份「這個地方好酷」，不忍心看遊客來來去去只逛老街，因而產生一種榮譽感，決心向旅人分享更多地方故事（A9:4）。這種從觀光中孕育的新認同，使部分返鄉年輕人成為文化傳承與創新的生力軍。

但另一方面，過度依賴觀光的發展模式也引發地方社區結構和認同的轉變。首先是本地人口組成的改變：許多嗅到商機的外地業者進駐九份老街，租下店面經營餐飲和紀念品生意。據 A7 受訪者的估計，「九份老街店家八成以上都是外來的...本地人自己的房子自己做生意的很少，都是租給外地的」（A7:2）。也就是說，九份表面熱鬧，實則相當比例的經濟活動掌握在外來者手中，本地居民多數退居為房東或在外生活，社區的人口結構和生活樣貌已與傳統礦村大不相同。隨著夜幕降臨，觀光客散去，九份街區往往陷入空城狀態，A9 受訪者形容為「人來了就開燈，旅客走了就關燈...晚上的九份...很像打烊的樂園」（A9:7），缺乏常住居民的社區彷彿失去了靈魂。她憂心若只有觀光商業而無人在地生活，九份終將淪為沒有新故事產生的歷史陳列館。由此可見，觀光雖帶來繁榮，卻也造成地方社區「空洞化」的隱憂，弱化了原本紮根於日常鄰里的地方認同。

此外，旅遊人潮對在地生活的擠壓也影響居民對家鄉的情感。A8 受訪者坦言，許多土生土長的老居民其實並不歡迎觀光客過度湧入，「人一多遊客...對他們來說是困擾，垃圾又多...每一天都是這樣子，搞衛生就不好了」（A8:4）。假日遊客爭相開車進村，車位嚴重不足，道路堵塞，連上廟裡上廁所都造成當地人的不便。部分在地居民希望維持山城原有的寧靜與秩序，對觀光發展抱持矛盾心情：既受惠於其經濟效益，又因生活品質受影響而心生排斥。在觀光興起的時期，水金九居民的地方認同感因此呈現出複雜的轉型。一方面，家鄉成名帶來了新一輪認同資源；但另一方面，外來商業勢力與過量觀光客的湧入，使原本緊密的社區連結被稀釋，地方認同感出現商品化與弱化的危機。

歸結而言，觀光時代的水金九地方認同呈現出矛盾交織的景況。一方面，觀光讓這片山城重獲新生，居民在他者的目光中重新發現家鄉之美並肯定其價值，地方自豪感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商業化過程帶來的空間異化和社區解組，又使部分居民對家鄉產生失落與排斥心理。Harvey 的資本空間理論可解釋這一矛盾：觀光作為新的資本形式，為地方尋求了「空間解決」（spatial fix）以脫離經濟困境，但資本的逐利天性又不可避免地造成空間和社會的不平等影響，讓一些居民成為局外人。Relph 則提供了理解居民心理的視角：當地方被過度商品化時，其獨特的「地方感」可能被侵蝕，引發原住民對喪失真實性的憂懼和反感。Paasi 的區域身份理論則提醒我們，區域身份的再生產是權力角逐的場域——在觀光者、外來業者與本地居民的互動中，「水金九」這個區域的形象與認同被不斷重塑。觀光時期的地方認同，其實反映出區域身份再生產過程中的張力：外塑的旅遊意象與內生的生活感受並不完全一致，居民需要在觀光大潮中重新協商「我們是誰」「我們的家鄉是什麼」。這為下一階段——地質公園的導入——提供了社會文化背景：地方認同已被重新喚醒，但仍尋求一條在商業與文化之間取得平衡的新道路。

地質公園時期：永續理念下的認同重塑

近年來，水金九地區開始引入「地質公園」理念，試圖在觀光熱潮之外，以永續發展和社區參與的方式重振地方價值。2019 年，在地的黃金博物館與地方人士合作推動水金九地質公園籌劃，定期舉辦地質、生態與文化課程，培訓在地導覽員。水金九雖非正式掛牌的國家或世界地質公園，但已朝此方向經營數年。這一階段，居民透過重新發掘土地的自然與人文內涵，地方認同感有了新的生長點。

地質公園帶來的教育活動讓居民更深入地認識家鄉，激發出對地方新的驕傲與熱愛。A3 受訪者談到參加地質課程後的收穫，興奮地表示：「以前不知道自

己的家鄉是一個寶山，後來...了解說金瓜石真的是一個寶地」（A3:2）。透過專家講解，他才明白金瓜石蘊藏超過百種礦物、獨特的地質成因，這些都是過去在地人所不瞭解的珍貴資源。地質公園的知識使他對家鄉的價值有了全新體認，進而生出更強的地方自信心。A6 受訪者也分享了類似的經驗：因為喜愛家鄉的人文歷史，她參與了博物館的地質公園解說員訓練班，上課過程中接觸各領域專業知識，「更深入在我們自己的地方上面去了解更多的東西」（A6:1）。知識的增長使她對家鄉的認同感更為堅定，甚至主動投入志工服務，協助處理社區事務與導覽接待。可見，地質公園提供了一個重新認識地方的契機，透過教育賦權讓居民發現家鄉過去未受重視的價值，從而產生新的自豪與情感連結。

地質公園的推動過程本身，也在重織地方社群網絡，為地方認同感注入新的活力。相較於過去由上而下的產業興衰，地質公園強調的是由下而上的社區參與模式。A6 受訪者指出，地質公園希望提升旅遊的層次，其特色在於「由一般的住民、當地領袖帶領觀光客」（A6:1），讓來訪者深入瞭解當地的地質、生態與人文。為達成此目標，在地居民必須先行組織起來，共同投入導覽、調查、環境維護等工作。這種共同參與的實踐過程本身就凝聚了社區意識。A4 受訪者提到，他們透過辦「地方小旅行」、環境清理等活動，「創造很多的事件讓地方人可以參與...在過程中去認識地質公園」（A4:1）。例如帶領居民踏青認識在地植物、號召社區一起討論遊客管理等，在解決地方問題的同時，自然地將地質公園理念融入社區。這些在地行動不僅深化了居民對環境的了解，也重塑了鄰里合作的精神。正如 A9 受訪者所說，地質公園其實是一種「可以凝聚社區的一個模式」，藉由維護環境與文化，號召地方居民共同努力。在這過程中，居民不再只是旅遊業的配角，而是重新成為地方的主人翁，從而強化了對地方的認同和歸屬。

地質公園時期出現了新類型的在地參與者，他們為地方認同感帶來不同以往的面貌。其中一部分是外地移入的專業人士或文創工作者，他們被水金九的自然人文魅力所吸引，選擇長期居留，並積極參與地質公園相關工作。A7 受訪者觀察到，九份地區的商业化使本地居民參與度不高，但在水湳洞和金瓜石，聚集了一批外來的藝術家、作家等文化人，「他們雖然是外來的，但是常住在這裡...環

境會給他們創作靈感」(A7:3)。這些新居民並非為商業利益而來，更傾向於投入社區營造等文化活動。在地質公園的推動上，他們與老居民一樣出力：例如有人購置老房作工作室，協助舉辦展覽或生態調查等。他們的加入拓展了地方社群的邊界，使水金九的地方認同涵蓋了傳統礦山子弟與新興的創意族群。在共同的地質公園願景下，本地人和新住民逐漸形成合作關係，實現了魚幫水、水幫魚的雙贏。對老居民而言，外來專業人士帶來新觀點與資源；而對後者而言，投入地質公園不僅滿足了他們對自然人文的熱情，也提供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平台。如此一來，地方認同感不再侷限於原生居民的小共同體，而發展出一種更開放包容的形式——任何願意長期奉獻於此、認同這片土地價值的人，都成為地方認同的組成部分。

綜上所述，地質公園時期的水金九地區，地方認同感出現了重新凝聚和升華的跡象。透過知識賦能和社群參與，居民從礦業記憶和觀光商業的陰影中走出，重新發現家鄉深層的價值，並以主人翁的姿態投入家園永續經營。這種新的地方認同，融合了對自然生態的珍視、對文化資產的自豪，以及社區共同體意識的重建，為水金九的未來發展注入了源源活力。

第三節 認同感建立在經濟地理的基礎上

本章將深入探討地方認同如何奠基於經濟地理條件之上，分析人口外移、就業機會、社經地位、產業結構轉型與空間資本化等面向如何影響地方身份的生成與轉變。不同於以往以歷史時期（如礦業時代、觀光時代）為分段的論述方式，本章以經濟地理條件為核心脈絡，強調這些結構因素對地方認同的塑造作用。同時，我們將引入地理學相關理論觀點，包括 Harvey 關於空間與資本的論述、Relph 的地方/無地性（placelessness）概念、Paasi 關於區域身份再生產的見解，以及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論述，作為分析框架，輔以田野訪談資料進行辯證說明。地方認同在本研究中指涉的是居民對「我們屬於何處」的意識以及由此衍生的對自身社區的歸屬感和身份定位；這種認同並非靜態不變，而是隨著空間經濟條件的改變不斷被重塑和再生產。以下將分別就各經濟地理面向進行論述。

（一）就業機會與地方認同

緊隨人口變遷的是就業機會的消長，這是影響地方身份認同的另一關鍵經濟地理因素。職業結構不僅決定人口留存與否，更深刻形塑了居民對自我與地方的價值感受。在礦業時期，本地居民大多以礦工或相關產業為主要職業，礦工的身份曾是地方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挖礦雖艱苦但體面，礦工群體之間形成了強烈的袍澤情誼和共同的榮譽感。因此，當礦場關閉、大量礦工失業時，居民不僅失去了經濟來源，也失去了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依據。

A2 受訪者回憶當時的處境：「以前做礦工，雖然工作辛苦危險，但每個人都以當礦工自豪，收入也養得起一家人。礦關了以後，真的一時之間不知道能

做什麼，好多人被迫轉行，有的去當工地工人，有的乾脆離開去臺北找工作」（A2：2）。這段話突顯了就業機會消失對個人和社群的雙重打擊：個人層面，礦工轉眼變成失業者，自尊與認同受挫；社群層面，傳統產業瓦解使共同的生活節奏與價值觀出現空白，地方整體陷入迷茫。

經濟地理學者 Harvey 曾指出，資本在空間流動中具有高度選擇性，會集中投入有利可圖的區位，導致其他地區資源被撤離(Harvey, 2006)。礦業的資本撤出就是典型一例：資本逐利轉移，使得本地經濟樞紐突然消失，勞動力只好隨之遷徙或重新配置。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觀點來看，這種產業與就業的重新區位配置帶有路徑依賴效應——既有的產業集聚一旦瓦解，除非有新的優勢產業進駐，否則地方往往陷入長期的經濟低迷。就本研究案例而言，在礦業衰退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地方缺乏能夠接續吸納勞動力的產業，就業機會稀缺，導致地方對未來發展的信心下降，居民對自身角色的定位也趨於負面。正如 A11 受訪者所言：「當你早上醒來卻不知道今天還有沒有工作可做，就很難對這個地方懷抱希望，更別提什麼認同感了」（A11:8）。這反映出經濟上的不安全感如何蠶食對地方的認同——當土地無法提供賴以為生的工作，人與土地的聯繫就變得脆弱。

然而，轉機隨著新興產業的出現而來臨。在本案例中，隨著觀光業的興起，地方開始出現新的就業和創業機會。觀光客源源不絕的到來帶動餐飲、民宿、土產店等行業蓬勃發展，一些留守或返鄉的居民投入其中，重新找到了在地謀生的途徑。A5 受訪者便是其中一例，她分享道：「現在觀光客多了，我們幾個年輕人合資開了間茶坊。我負責泡茶解說，在家鄉也能賺錢養家，感覺跟以前很不一樣」（A5：5）。對於這批留在家鄉尋找新機會的年輕世代而言，地方認同開始重新建立在新的經濟基礎上：他們不再以礦工或工人自居，而是

以店家老闆、導覽員等新身份來定義自己與地方的關係。能夠「在家鄉賺錢」本身成為一種自豪，證明了地方仍有價值可挖掘、仍是自己屬於的地方。

綜上，在經濟蕭條期，就業機會匱乏削弱了地方認同感；而在新經濟機會出現後，居民透過參與新的產業重新找回與土地的連結，地方認同亦隨之調適轉型。這一過程證明，經濟基礎與身份認同息息相關：正如馬克思主義地理學所強調的，物質生產和再生產的空間佈局深刻影響社會文化的空間(張京祥等人, 2014)。就業機會作為經濟地理的具體體現，對地方認同的塑造與改變功不可沒。

(二) 社會經濟地位與地方認同

人口與就業的變遷進一步引發社會經濟地位在地方內部的差異變化，這些差異同樣會反映到地方認同上。社會經濟地位 (Socio-economic status, SES) 包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職業類別等要素，它決定了個人在社區中的經濟實力和社會資本(胡榮, 2003)。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地方居民的社經地位版圖可能被重繪：舉例而言，某些家庭因抓住觀光商機而致富，另一些則可能因未能適應新產業而陷入困頓。這種階層分化對地方認同具有複雜的影響——地方認同本應是一種跨越階層的集體歸屬感，但當地位差距擴大時，社群內部對「我們是誰」可能出現多元甚至矛盾的詮釋。

在案例社區中，我們可以看到社經地位變遷的幾種典型情況。首先，一部分傳統上相對富裕的家庭，在觀光興起後透過房屋租賃、開設店鋪等方式進一步提升了經濟地位。他們往往成為新經濟時代的受益者，也成為地方意見領袖之一。A6 受訪者談到：「我們鄰居有些本來就有幾棟老房子的，現在租給外地來的商家開店，每年光租金收入就不少。相比之下，沒房產的像我們這種，就

只能自己做點小生意」(A6: 2)。這顯示出擁有資產者與無資產者之間的差距在觀光時代被放大。前者借由資本運作鞏固了自身的社經地位，而後者若無法順利轉型，只能維持生計，可能感受到被邊緣化。

這種差異投射到地方認同上時，產生了不同的心理狀態：對於成功受益者，他們更有條件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地方公共事務，並傾向於積極塑造新的地方形象和敘事，例如投入社區發展協會、參與文化活動，強調這裡現在如何繁榮有名。這有助於他們強化對地方的認同，因為地方的繁榮與個人成功緊密相連。然而，對於觀光熱潮中處於弱勢的居民而言，他們的地方認同感可能反而受到削弱甚至轉為質疑。A11 受訪者的觀點便代表了部分弱勢者的心聲：「現在村裡賺錢的是那些有資源的人。他們開民宿開店鋪，看起來風光。但一般居民得到的實際好處有限，房價倒是被他們炒高了。我們變成看熱鬧的，自己的生活反而更困難，憑什麼要對這種現況感到認同？」(A11: 3)

值得注意的是，社經地位差異並非僅帶來負面影響。在某些情況下，它也可能透過地方內部的調適機制重新趨於平衡。例如，較富裕的居民可能出於鄉土情懷和社會責任感，對弱勢鄰里提供幫助，從而維繫社區凝聚。A2 受訪者透露出地方社會資本的運作：透過非正式的互助網絡，縮減了經濟不平等對生活基本面的影響，同時也強化了「我們是患難與共的一家人」這種集體認同。在這層意義上，雖然客觀的社經差距存在，主觀的地方認同感卻未必線性遞減——關鍵在於社區是否具備內生的團結機制和文化價值去調和物質差異。如果社區仍奉行著傳統的守望相助、美德互惠等價值觀，那麼經濟強者與弱者之間仍可能維持認同上的連帶。

Paasi 的區域身份理論提醒我們，區域身份的形成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維度的制度實踐，它是一個不斷被再生產的過程(Paasi, 2003)。社經地位差異所引發的認同張力，可以被視為地方身份再生產過程中的一種內部辯證。

一方面，不同階層對地方的情感歸屬和敘事各異，形成了多元的身份表述；但另一方面，透過社區互動和文化整合，這些差異有機會被納入一個包容性的地方身份框架中。在地方社會內部，各階層透過對地方不同側面的認同貢獻，實際上豐富了地方身份的內涵。

社會經濟地位的變化對地方認同既可能產生分化效應，也可能在社區調適下趨向統合。經濟利益的分配不均確實會動搖傳統上齊一的身份感，但若社區能運用文化與社會資本加以調節，則地方認同仍可維持其整體性。這提醒我們分析地方認同時需同時關注物質和文化兩個層面：物質條件及經濟地位塑造了認同的現實基礎，但文化價值和社群實踐則決定了認同的韌性和包容度。

（三）空間資本化與地方認同

所謂空間資本化，指的是空間（土地、地景、地點）被賦予經濟價值並加以開發利用的過程。在觀光開發中，空間資本化現象格外明顯：地方的空間從日常生活場域轉變為經濟資源，街區、建築、景觀都可能成為可交易的資本（如店面租賃、景點門票、不動產炒作等）（宋郁玲, 2022）。這一過程深刻影響地方認同，因為當生活空間轉化為商業空間，居民對空間的情感聯繫和認同感也會隨之改變。

在水金九地區，老街的變遷是空間資本化的縮影。過去，老街及其周邊空間承載著居民日常生活功能：菜市場、雜貨店、茶館、戲院、廟埕等，構成了地方社區互動的空間網絡。A6 受訪者回憶道：「我們以前買菜、看電影都在老街，那裡不僅是商業區，也是大家每天碰面的地方。特別是廟口廣場，傍晚很多鄰居會去那聊天乘涼，很有生活味。」這說明在資本化之前，空間主要服務於在地居民需求，具有強烈的「地方性」——也就是 Relph 所說的地方的存在感與歸屬感，人們在那些空間中體驗到熟悉和舒適(Relph, 1997)。

然而，隨著觀光興起，老街的空間被逐漸資本化：原本賣日用品、米油雜貨的店面改裝成售賣紀念品和小吃給觀光客的商舖；廟埕、戲院等場所也被納入觀光路線，甚至興建新的景觀設施以吸引遊客。空間用途的轉變伴隨著產權和資本的介入——許多本地人將自家臨街房屋高價租給外來業者經營，有的乾脆出售房產套現離場；同時也有外地投資者看中此地商機，購買老屋重新裝修後作為網美咖啡廳、精品民宿。這種空間重組帶來直接的經濟效益，但對在地居民的空間認同造成擠壓效應。正如地理學者 Harvey 所揭示的，地方為了迎合資本而競相打造特殊景觀，結果卻常導致地方感被稀釋，在城市之間複製出連鎖般相似的環境(Harvey, 2006)。九份老街出現的某種程度的「觀光地景同質化」現象印證了 Harvey 的論點——當地攤販販售的商品、街道佈置的風格，與其他觀光景點開始類似，地方空間逐漸失去獨一無二的意義，成為一種可以被資本隨處再現的模板。

居民對此變遷的感受複雜而矛盾。一方面，看到昔日蕭條的街區因觀光而繁榮，店鋪林立、人潮往來，不少居民為此感到振奮，認為這象徵家鄉重新煥發生命力。A10 受訪者就表示過：「以前黃昏以後老街都沒人、黑漆漆的，現在每天觀光客好多，我有時也會去老街走走，看人來人往覺得很熱鬧，有種我們這裡很受重視的感覺。（A10：2）」在他看來，空間的資本化帶來的是一種榮光，讓他產生自豪，彷彿老街成了聚光燈下的明星，自己的家鄉終於不再被遺忘。

但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居民對空間資本化心生疏離與不滿。A2 受訪者坦言：「老街現在白天都是觀光客，我們本地人反而不會去逛。想買日常用品老街也買不到，得下山去超市。白天老街變成他人的世界，晚上店關了又變死城。我有時走在老街，兩邊都是紀念品店，感覺不像自己的家，好像自己變成外人。（A2：2）」這種疏離感折射出地方感的喪失：當熟悉的空間不再為自

己所用，而是完全讓渡給外來者消費時，居民對那片空間的歸屬感隨之下降，甚至出現「在自己家卻彷彿客居他鄉」的錯位感。這正是 Relph 所定義的無地性後果——地方的獨特意義被覆蓋為標準化的旅遊商品，居民對空間不再有最初的親密連結(Relph, 1997)。

A11 受訪者對空間資本化持最尖銳的批評態度。他指出資本對地方空間的入侵不僅改變商業型態，更加劇生活不便和社會不公：「現在老街上的攤位、一間間店，背後都是大財團或外來有錢人在運作，本地小民擠不進去。我們連逛老街都懶得去，人擠人又買不起那些東西。老街已經不是我們的了，它只是資本的賺錢工具。(A11:5)」在他看來，空間資本化等同於空間被外部勢力殖民：在地人喪失了對自己空間的控制權和收益權，淪為看客甚至局外人。此觀點揭示了空間資本化與社會權力的關聯——空間轉化為資本後，其利益多為資本所有者攫取，如果在地社群無力參與分配，那麼空間改造帶來的繁榮對他們而言可能只是表面風光，實則加劇相對剝奪感和身份危機。

面對空間資本化對地方認同的不利影響，社區和政府層面也出現了一些調適措施。例如，一些社區組織倡導「在地空間在地用」的理念，鼓勵保留部分空間供居民交流使用：如在老街旁開闢居民市集或社區據點，不對觀光客宣傳，只提供本地服務，使居民仍有屬於自己的角落。地方政府則規劃了一些日常生活機能的重建，譬如興建新的市場或超市在山下方便居民購物，以彌補老街商業空間轉型造成的生活功能缺口。還有學者和規劃者建議透過空間規劃手段，維持觀光區一定比例的在地業者與傳統店鋪，以保留地方原有風貌並讓居民參與經濟收益。這些舉措的目的，在於平衡空間的經濟價值與社會文化價值，尋求資本與地方的共存共榮。

從理論層面而言，空間資本化過程中地方認同的消長，再次證明了 Harvey 所說資本主義的矛盾本質：空間越是全球流動，地方越想強調自身差異以吸引

資本，但過度引資又可能抹殺這些差異，導致空間的碎片化和認同的不安全感 (Harvey, 2006)。觀光資本的流入使地方面貌日新月異，但如果處理不當，地方反而可能變得面目模糊，居民不知如何認同一個快速商品化的空間。為避免此，Relph 強調關注地方的「意義」，即空間所承載的人地關係必須被尊重。Paasi 亦會建議將地方符號融入空間治理中，使空間轉型伴隨地方意識的強化，而非淡化。由此觀之，空間資本化並非一定侵蝕地方認同，關鍵在於社群如何回應：若能在資本運作中堅守並彰顯地方獨特價值，則經濟收益與身份認同可兼得；否則，認同危機將難以避免。

(四) 小結

透過以上各節討論，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地方認同與經濟地理條件間的密切關聯。人口、就業、社經地位、產業結構與空間利用等要素，構成了地方生存與發展的基礎框架，也為地方社群提供了身份想像的素材和邏輯。本章的分析表明，地方認同並非一成不變的傳統產物，而是在特定經濟地理環境中不斷被建構和再生產的動態過程。

首先，地方認同的內涵會隨經濟條件轉移而轉變。礦業繁榮時期，「礦工小鎮」的集體記憶賦予居民榮譽與歸屬；礦業沒落後，人口外移與就業困難使認同感一度陷入低谷；觀光興起又為地方注入新生命，新的身份敘事逐漸成形，但同時引發傳統認同的矛盾與調適。這種此消彼長的變遷，實質上是地方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對「我們是誰」的不斷回答與提問。每一階段的經濟地理條件，都為這個問題提供了背景和約束：人往何處去、財從何處來、地如何被用——答案不同，塑造出的地方身份便異。

其次，地方認同的強度和範圍也取決於經濟地理條件是否提供了共通的社會基礎。在經濟穩定、社群同質性高的情況下（如礦業時代的工人階級社

區），地方認同往往明確而強烈，因為人們共享著類似的生活經驗和命運；而在經濟分化、社群結構多元的情境下（如觀光時代的階層分化和外來者湧入），地方認同可能變得複雜且含混，甚至出現多重乃至衝突的認同版本。這提醒我們，地方認同並非單一的聲音，而可能是多種聲音的合唱。正如本研究所蒐集的訪談所示，面對同一塊家鄉之地，不同的人（不同世代、階層、本地或移居等）有著不同情感投射：有人懷念過去、有人擁抱未來、有人憂心當下，交織出豐富的論述。這些觀點透過我們對黃鴻忠等反思者的引述，與其他受訪者的經驗敘事形成對照，體現了地方認同內部的辯證張力。而唯有正視並包容這種多元，地方認同才能得到完整且深刻的理解。

第三，經濟地理條件影響地方認同，但地方社群對認同的主體建構同樣會反作用於經濟地理發展路徑。也就是說，居民如何看待自己與家園，將影響他們採取何種行動來改變或維護經濟地理現實。例如，若居民對觀光資本入侵持強烈抵制態度，可能會通過社區運動影響政策，使開發降溫（從而影響經濟走向）；反之，若居民普遍認同觀光帶來的榮耀並積極投入，則觀光經濟將更加蓬勃。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當前九份社區中既有像黃鴻忠般批判觀光弊病的聲音，也有像 A5 般將傳承與觀光融合的積極實踐。這些行動者所形塑的敘事和實際舉措，正在一點一滴地改造地方的經濟地理樣貌。例如，推動深度文化旅遊路線、倡導觀光收益回饋居民等，都是在經濟層面引入社會考量的努力，其背後正是地方認同在發揮作用——認同感驅動居民追求更加公平、可持續的地方發展模式。事實上，有研究者指出，在觀光過度的地區，重新想像所謂「真實性」是走出困境的關鍵；對居民而言，「真實的地方」意味著日常生活方式的延續，而對遊客而言則可能是戲劇化的體驗。當地居民如能引導觀光向符合本地價值觀的方向發展，那麼經濟收益與地方認同就不再衝突。這正是地方認同反哺經濟地理的體現。

最後，以理論觀點總括之：Harvey 提供了理解資本主導下空間變遷對地方的宏觀視角，提醒我們警惕快速資本流動下地方獨特性的喪失；Relph 則從人本經驗出發，強調地方意義與歸屬感的重要，並點出了當代地方在全球化浪潮下可能遭遇的「無地性」危機；Paasi 進一步將地方（區域）身份置於歷史制度化的進程中，闡明了地方認同如何在經濟、政治、文化交織的實踐中被反覆生產。本章實證了這些理論在具體案例中的呼應：地方認同的確是隨空間生產而變，與資本力量既博弈又共舞。所幸的是，我們也看到地方並非消極被動的一方——透過在地居民的行動和反思，地方認同依然在主導著屬於自己的敘事。九份的故事告訴我們，經濟地理是地方認同的基石和判準，但最終給予這塊土地靈魂的，仍是人們對家的情感與記憶。經濟興衰輪轉，空間再造更替，而那份對家園深沉的認同，將在時代的風雨中持續塑造並見證地方的明天。



第四節 地質公園對地方認同感的影響

推動水金九地質公園的主要角色包括新北市政府（經由文化局所屬的黃金博物館）、當地社區組織及居民、以及專業學術團隊。2019 年起，新北市黃金博物館與瑞芳區各社區合作，委託臺灣地質公園學會等專業團隊，實施「金水地區地質景觀資源盤點」計畫。黃金博物館於 2020 年完成地質資源盤點報告，盤點出 14 處具代表性的地質點，作為未來地質公園範圍的劃定依據。根據規劃，2021 年黃金博物館正式向主管機關申請將這 14 個地質點列為法定地方級地質公園；2022 年則陸續舉辦「水金九礦山學」研究計畫與解說員培訓課程，培育社區導覽人才並推廣地質教育。整體過程呈現政府、社區、民間協會共同協作的模式：政府提供政策協調與資源，黃金博物館負責整合礦業遺產與地質資料，民間協會與學者進行專業調查，社區居民參與解說與維護，聯合推動地質公園的成立。

「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指定」第 2 次公聽會，於 114 年 5 月 6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30 分，於瑞芳區公所 3 樓大禮堂辦理。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終於又往前邁出一步。後續就等農業局委請審議委員召開最後的審議會。水金九地區推動地質公園的過程中，既有明確的動機與誘因，也面臨現實的問題與挑戰。瞭解這些誘因與挑戰，有助於評估地質公園計畫的可持續性和改進方向。

一、誘因方面：

（一） 保護珍貴地景與傳承礦山文化

促使在地居民投入地質公園的首要動機，是對家鄉獨特自然、人文資源的珍惜與熱愛。許多受訪者提到，水金九擁有全臺灣獨一無二的地質與礦業遺產——大規模的金銅礦體、特殊的硫化礦生成地質，以及日據時代留下的礦坑和煉礦遺址，這些都值得被好好保護。A2 受訪者強調，這片土地「養育了我們」（A2:1），飲水思源，理當愛護家鄉這麼特殊的地方。他對地質公園理念

非常認同，認為成立地質公園可以「把這個地方維護好」，「不管未來經濟怎麼樣，先要把它保護好」。A3 受訪者也直言，參與地質公園就是要「保護我們自己的家鄉的多元」，調查有哪些動植物值得保護（A3:3）。地質公園提供了一個架構，讓居民可以有組織地守護家鄉的山林與文化。透過這個平台，老礦工們得以將自身對礦山的情感轉化為行動：保養礦區步道、修復礦業文物，把金瓜石的歷史完整地留給後人。這種對故土遺產的使命感，是地質公園最大的推動力之一。正如 UNESCO 所強調的，地質公園採取整體保育與教育並重的方式，透過提升人們對地質遺產重要性的認識，讓在地居民對其地區產生自豪感，強化他們與地方的認同。水金九居民正是抱著這份自豪與珍惜來推動地質公園，以確保家鄉的山川故事永續流傳。

（二） 促進永續觀光與經濟轉型

地質公園被視為一條走向永續發展的出路。經歷觀光熱潮的洗禮後，居民意識到純商業觀光的脆弱與局限，希望藉由地質公園提高觀光品質、延長遊客停留時間，進而帶動地方經濟轉型。A9 受訪者提到，他們推出夜間生態導覽等活動，就是為了讓旅客體驗在地生活，「值得回味的體驗」（A9:2），不再只是白天擠在老街人潮中。這種創新觀光內容有望吸引回頭客，並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如專職導覽員、生態解說員等。對年輕一輩而言，地質公園開啟了返鄉創業的新可能。A5 受訪者就是看到地緣機會才選擇來九份發展，他認為地質公園除了自然科學，也包含教育、文化永續和提升居民認同等面向（A5:1）。這樣廣闊的議題為各種專長的人提供了用武之地，不論是導覽、教學、研究還是商品開發。地質公園的發展如果順利，將逐步孵化出一批在地社企或社區營造項目，使地方經濟不再侷限於傳統觀光。而政府部門對地質公園的重視（例如新北市府近年對水金九地區的投入）也可能為地方帶來建設經費，改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進一步提升投資與居住環境。這些都構成居民支持地質公園的現實誘因：期盼在保護中發展，實現經濟、社會與環境的三贏。

（三） 凝聚社區與提升形象

水金九由於歷經產業盛衰、人口流失，社區凝聚力一度薄弱。地質公園的推動過程本身即是一種社區重組的契機。居民看到了團結合作的重要性，也渴望借此擺脫外界對水金九「沒落礦區」或「觀光商圈」的刻板印象，打造一個結合自然、生態、文化的新形象。參與訪談的居民普遍為能和鄰里共事而感到開心，如 A6 受訪者退休後投身志願服務，在過程中認識了許多本地同好。對他們而言，地質公園不僅是一個專案，更是重新認識鄰居、找回社區歸屬的旅程。另一方面，他們也期待水金九能以「地質公園」之名重返公共視野。正如 A4 受訪者所言，九份、金瓜石本就非常有名，但希望讓外地人知道這裡不止有老街，更有豐富的自然人文內涵，而地質公園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整合的平台。未來若能取得官方地質公園資格，水金九的品牌價值和國際知名度將大為提升，這對居民而言也是一種莫大的榮耀與肯定。因此，從社區發展的角度看，推動地質公園蘊含著重塑地方身份的誘因——讓水金九從歷史的背影中走出，轉型為創新永續社區的典範。

二、挑戰方面：

儘管地質公園願景美好，實踐中仍面臨多重挑戰，需要克服方能長久發展。

（一） 人力資源不足與高齡化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提及，人手不足是目前最大的問題之一。水金九常住人口本就不多，能投入社區公共事務的人更有限。現有地質公園推廣成員以中老年志工為主，他們熱情可嘉但體力、創新能力可能有限。A7 受訪者坦言，成員中退休教師居多，做法上偏保守，被動等客上門導覽，欠缺主動的活動力（A7:1）。要突破這種困境，就需要更多年輕力量加入，但前一節所述，吸引年輕人回流本身就不易，形成一個兩難局面。一方面現有志工年事漸高，未來接棒者在哪？另一方面，如何在短期內讓年輕人看到參與地質公園的價值，願意投入時間精力，是急需思考的課題。A1 受訪者提到，之前培訓 40 名導覽員

遠遠不夠，如果地質公園組織化後勢必要再招募新血（A1:4）。然而若地質公園無法提供一定報酬或發展前景，光憑理想很難長期留住年輕人才。因此，人力與後繼者問題是地質公園永續經營的一大挑戰，需要透過改善待遇、強化認同等方式來逐步解決。

（二） 組織整合與協調困難

雖然地質公園強調社區由下而上參與，但在現實操作中，組織協調並非易事。目前水金九的地質公園推廣仍處於鬆散合作狀態，尚未成立統一的協會或管理機構。A6 受訪者指出嘗試成立協會時遇到一些困難：各人成員想法不一、作息難以配合，且三個聚落人數參與不均衡。九份因觀光業繁忙，可投入的人相對較少；金瓜石、水湳洞則已有自己的社區組織，如何融合也是問題（A6:2）。目前僅能先以導覽志工隊形式運作，缺乏法人身份限制了對外爭取資源的能力。此外，在決策過程中，新舊觀念的衝突也需磨合。A7 受訪者也提到，一些高層人士（地方意見領袖）有意求新求變，但某些資深成員行事保守，使得推動策略難以快速調整（A7:1）。例如是否擴大對外宣傳、如何應用新媒體等議題，就出現觀點分歧。要克服這些內部挑戰，需要領導者具備整合溝通能力，在尊重資深者經驗的同時，引入年輕成員的創意，找到傳統與創新之間的平衡。

（三） 居民參與度不均與認知落差

地質公園在社區內部的滲透深度仍有限，大多數普通居民對其認識不多。A7 受訪者直言：「在地人他不見得知道我們這裡有一個水金九地質公園」（A7:2）。由於人口外移和老化，許多中老年人不用社群媒體，資訊傳播不易。目前主要靠參與者口耳相傳擴散，但整體覆蓋率有限。部分商家或居民可能仍將地質公園視為與己無關的「政府計畫」或學術活動，缺乏參與動機。在九份，商業利益導向的外來店家占多數，他們關心的是遊客數量和營業額，

對地質公園強調的保育理念未必感興趣。如何將這些利益相關者納入地質公園的願景，是一項挑戰。另外，居民對地質公園概念本身也存在誤解。A5 受訪者就指出，大眾一聽「地質公園」四字，直觀聯想只有地質景觀，認為和社區生活無涉（A5:1）。他認為必須先破解這種迷思，讓大家明白地質公園其實涵蓋社區、教育、文化等層面。這需要有效的對內宣傳與教育，使居民了解地質公園並非高高在上的學術名詞，而是與日常環境、生活品質息息相關。若居民本身的認知與參與度無法提升，地質公園計畫就缺乏廣泛的民意基礎，推行起來阻力會很大。

（四） 永續經營與利益平衡

地質公園著眼長遠的永續發展，但現實中難免面臨短期利益的誘惑與壓力。例如，在開發與保育之間如何拿捏，就是一大挑戰。隨著地質公園名氣漸增，未來可能吸引更多遊客和投資。如果管理不當，反而可能重蹈過度觀光的覆轍，對環境造成新的衝擊。A3 受訪者就擔心，若過早對外揭露某些脆弱的遺址景點，可能引來網紅打卡，反而導致有關單位因安全或保護考量而封閉該區域，得不償失（A3:5）。因此需要有周詳的規劃，循序漸進地開放觀光據點，同時做好承載量管理，避免陷入「愛之適足以害之」的困境。另外，地質公園牽涉多方利益，如何協調政府、業者、居民三者的關係也是挑戰。地方政府或許期望藉地質公園提升觀光收益，業者關注商機，居民關心環境與生活品質，三者目標不盡相同，需要通過協商取得平衡。若某方訴求被忽視，可能引發反彈影響計畫推行。幸而目前水金九地質公園仍處草創階段，各方仍能保持彈性調適。但隨著規模擴大，建立正式制度時，就必須審慎設計治理架構，確保社區主體地位，同時爭取政府資源與業界合作，以維持地質公園運作的財務與人力支撐。

總體來說，水金九地質公園的推動充滿了理想與現實的拉鋸：有熱情也有瓶頸，有機遇也有風險。當地居民之所以仍義無反顧地投入，是因為誘因足以驅動——對家鄉的愛與責任。然而，要讓這份理想長久地維持，則需要正視並

克服上述挑戰。在地居民正以務實而積極的態度，一步步尋求解決之道，例如持續招募培訓新成員、嘗試組織化爭取資源、加強內部溝通與宣導等等。未來隨著經驗累積與外部援助到位，這些挑戰有望逐漸緩解，使地質公園的願景更加可期。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以地質公園之概念，來探討水金九地區居民的地方認同感。本研究經由面對面訪談，共計對11位受訪者進行訪談，將所得的結論歸納為六項分別加以探討。

本章首先將本研究結果，包含「地方認同感」、「不同時空背景下的地方認同感」、「認同的建立在經濟地理的基礎上」、「地質公園對地方認同與歸屬的影響」等四項所獲得之結論；其次，列出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所遇之限制；最後，提出相關建議與後續研究。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揭示了水金九地區居民對家鄉的地方認同感與地方記憶在不同時空階段的變化特徵，以及影響認同感的主要因素。研究結果顯示，地方認同感主要源自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居民對家鄉的深厚情感往往來自於長期生活經驗、日常互動與家鄉故事的累積。多位受訪者強調，對家鄉的親情與懷念，例如「飲水思源...我們的家鄉啊，一個這麼特殊的地方」

（A2:1）、「這就是我的家鄉，我退休就回來這裡...也是地方連結情感」

（A3:3）等，都反映了情感依附如何成為認同感的核心來源。這種情感連結使故土成為心靈的歸屬所在，即使人們因工作或求學外出，他們仍保有對家鄉的眷戀與回歸渴望，並從中汲取面對生活挑戰的心理力量。

此外，共同經歷與集體記憶也極大地強化了地方認同感。當居民共同參與社區活動或面對事件挑戰時，所形成的集體經歷進一步凝聚了群體間的情感聯繫。受訪者指出，透過分享過去的成長經歷、地方故事和文化特色，個人的記憶逐漸形塑為集體的回憶與歸屬感。例如，A9受訪者提到：「一起做就會有一起的經驗，一起的經驗就會有群體的形成，他才有...驕傲感」（A9:6），顯示共同參與可促發自豪感並強化認同連結。

社區參與和投入也是形成認同的重要面向。當居民積極投入地方建設與公共事務（例如參與地方廟會、環境維護、撰寫家鄉故事等），不僅促進了社區發展，也強化了居民間的互信與共同體意識。訪談中多位受訪者提及願意為地方付出心力，如「我也會願意付出努力去為這個地方更好」（A5:3）、「朋友要是說想辦活動...就來我們九份」（A10:2），顯示社區參與行動提升了對家鄉的自豪感與責任感。這些參與經驗豐富了地方認同，使居民不再只是被動受益者，而成為積極共建家園的主人翁。

另外，研究發現外地人也能透過長期融入產生地方認同感。儘管外地人的認同過程更為緩慢，需要長期生活與深入了解，但訪談顯示，不少外來居民在參與社區活動後對水金九產生了深厚情感。例如，A7受訪者表示「因為工作需要...我比較屬於情感方面的連結」（A7:6），說明外地人也能在觀察互動後逐漸建立歸屬感。這種多元參與豐富了社區文化，也促進了不同群體間的融合。

進一步比較不同時空背景，研究將地方認同感的演變分為四個階段：礦業興盛期、礦業衰退期、觀光興起期與地質公園時期。在礦業興盛時期水金九因豐富金礦而迅速繁榮，人口激增、社區富庶，居民對礦工身份充滿自豪。受訪者A8回憶道，在外求學時提到金瓜石人，別人都會誇讚「哇！礦山！你們祖先不是都挖礦的嗎...我們是礦山出來的自豪」（A8:3），可見社會對礦工的高度認可強化了居民的身份認同。此階段的經濟繁榮也滋養了「礦山文化」，形成獨特社群凝聚力，居民即使付出高風險也樂於投入礦業，並將該歷史視為地方榮耀，作為認同的歷史根基。

礦業衰退時期則帶來截然不同的景象。隨著金礦耗盡、礦場關閉，村落陷入衰落，年輕人大舉外移，留下多為老弱婦孺，街區冷清、商店停業，社區網絡瓦解。這種「掏空化」現象反映了人口劇減對地方認同的衝擊：勞動力流失與經濟消退使居民對未來失去信心，原有的歸屬感和驕傲感迅速沉寂。然而研究也發現，儘管表面蕭條，對家鄉的情感依戀和鄉愁並未完全消失。離鄉遊子往往透過節慶或返鄉小聚來重溫共同記憶，A3受訪者指出「很多老鄉的心一直還留在金瓜石，.....內心深處仍舊時刻牽掛著故土」（A3:2），顯示即便身處異地，認同感已轉化為對「共同體想像」的一種延續。另有留守者（多為中年

同輩)則因人數減少而更團結,聚在一起回憶往昔,並努力向年輕一代傳承礦區歷史。整體而言,此階段代際斷層明顯:離鄉者的家鄉印象停留在離開時的最後景象,而留守者則在衰敗中重新思考「我們是誰」,將注意力轉向保護歷史記憶、維繫地方認同。

觀光興起時期使曾經沉寂的山城重新活絡起來。《悲情城市》等文化創作使水金九成為知名旅遊勝地,觀光帶來的經濟機會大幅提振居民的自豪感。研究顯示,許多年輕一代在此階段選擇返鄉發展旅遊產業,如經營茶坊、民宿或博物館,並以此為榮(A9:4)。例如一位接手經營博物館的年輕受訪者說明:「九份『這個地方好酷』,.....不忍心看遊客只逛老街,於是決心向遊客分享更多地方故事」,反映返鄉年輕人從觀光中重新找到榮譽感並成為文化傳承的推手。這種認同的轉型表明,觀光熱潮提供了新認同資源,讓地方文化以新的形式被強化。

然而,過度商業化也弱化了原有的認同基礎。受訪者觀察到,九份老街商業經營多由外地業者主導,大部分店面非在地居民所有,估計「九份老街店家八成以上都是外來的.....本地人自己的房子自己做生意的很少」(A7:2)。結果,表面上雖熱鬧,夜晚卻如「打烊的樂園」(A9:7),缺乏在地常住人口的社區失去活力。部分老居民對大量遊客亦感到困擾,抱怨生活品質受影響(A8:4)。因此,在旅遊興起期,地方認同呈現兩面向格局:一方面,觀光成功帶來榮耀與經濟,刺激部分居民以家鄉文化為傲;但另一方面,觀光商業的外向化和人流擁擠造成了社區「空洞化」危機,削弱了基於日常鄰里生活的深層認同。

進入地質公園時期地方認同出現了新的重塑與升華。雖然水金九尚未取得正式地質公園資格,但在地組織已舉辦地質、生態與文化課程,培訓志工導覽員。研究發現,透過這些教育活動,居民對家鄉的自然與歷史有了全新的認識。一位受訪者興奮地分享:「以前不知道自己的家鄉是一個寶山,後來.....了解金瓜石真的是一個寶地」(A3:2),表示通過地質知識獲得自信與驕傲。另有參與導覽員培訓的居民指出,增長的知識使她對家鄉認同更加堅定,甚至主動投入志工服務。可見,地質公園提供了一個重新發現地方價值的契機,讓

居民在認知層面找到新的驕傲來源。此外，地質公園的推動強調社區合作模式，凝聚了原本分散的社群。居民共同參與規劃行程、環境清理、地質踏查等活動，不僅增進了互助經驗，也重新激發了主人翁意識。例如，居民自辦「地方小旅行」和植樹活動，在解決地方議題的過程中，自然融入地質公園理念，藉此建立了新的社區連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亦出現一批外地藝術家、作家等新移民投入社區建設，他們被水金九的魅力吸引，與老居民並肩推動地方營造，使地方認同擴展為兼容傳統與創新的多元集體。總結而言，地質公園時期的水金九，居民認同感呈現重整與提昇的跡象：以知識為基礎的新認同、社群參與的意識，以及對自然與文化並重的價值結合，共同為地方注入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活力。

綜合上述，本研究從情感、參與、歷史與經濟等多角度揭示了水金九居民的地方認同感特質：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共同經歷與集體記憶、社區參與度與付出、以及外地人參與四大面向相互交織，共同塑造了居民對家鄉的認同與自豪。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地方認同則呈現動態演變——從礦業時代的自豪，到衰退時的失落與懷念，再到觀光時代的繁榮驕傲與空洞焦慮，最後在地質公園概念下重新凝聚並轉化為新的認同形態。值得強調的是，本研究發現地方認同並非單一聲音，而是在多元群體間交織成豐富論述：不同世代、階層、在地或新移入者對同一片土地各有不同情感投射（有人懷念過去、有人成長期盼未來、有些憂心當下），這些多元觀點構成了地方認同的複合面貌。

本研究的發現對地方認同理論與人地關係研究具有幾點重要貢獻與啟示。首先，我們的研究實證了地方認同是一種多層次的社會心理現象，印證了 Relph (1997)提出的「存在的地方感」與 Paasi (2003)區域身份再生產理論等觀點。居民的敘述顯示，地方認同並非僅止於地理位置的抽象概念，而是融入了情感依附、文化符號與歷史記憶。例如，本研究中居民對礦業榮景和文化遺產的珍視，佐證了 Paasi (2003)所言：區域身份通過共享文化與傳統而被塑造，而地方認同正是居民共同認同家鄉特色的體現。另一方面，研究發現礦業衰退與人口外移導致的認同斷裂，反映了 Relph 所警示的「無地性」

（placelessness）危機：當地方失去經濟活力與居民活躍時，人們對家鄉的歸屬

感亦會脆弱。同時與 Harvey (2006)關於空間與資本的論述相互照應：資本遷移使水金九經濟中心消失，居民隨之遷徙，從而動搖了以產業為核心的集體認同。所引述 Harvey 的觀點顯示，資本流動具有選擇性，易造成地方特質的流失，這與我們觀察到的礦場關閉對認同的衝擊高度一致。

此外，本研究也補充了人地關係研究的理解。傳統研究常強調自然環境如何塑造人文活動，而本研究顯示，人與地的關係具有相互塑造的動態特性。水金九居民對環境資源與文化遺產的重新詮釋，不僅是被動接受環境變遷，而是主動通過地質公園等行動，試圖在經濟轉型中重建與自然的連結並賦予地方新的價值。我們看到，地方社群在認同建構上也反作用於經濟路徑：如許多居民利用認同作為倡議更永續發展模式的動機，推動深度旅遊或收入回饋方案等政策改變，正體現了居民對人地關係的主體建構。換言之，認同感不只是依附在某地，更是指引居民行動改變人地關係的內在動力。

最後，研究強調了多元觀點的重要性，這在地方認同與人地關係的文獻中仍待補充。受訪者群體包括不同年齡、職業與背景的人，他們對相同空間有不同期待和焦慮，形成了豐富的地方敘事。這與 Cuba & Hummon (1993)強調的「我們（在地）與他者（外來）之分界」相呼應：我們發現，即使在同一社區內，人們透過認同地方來強化自身獨特性，參與行為也能顯著提升歸屬感。透過質性方法的多元資料呈現，本研究捕捉到上述不同認同聲音，凸顯在複雜社會地景中「多重地方認同」的樣貌，為理論提供了案例佐證。

本研究不僅從經濟地理條件與社會互動脈絡闡釋了地方認同的生成，也呈現了地方認同如何反饋影響社區發展的動態過程。這些發現豐富了地方認同理論，證實了 Harvey、Relph、Paasi 等理論在實證案例中的適用性，並提醒學界在研究人地關係時須重視社群主體性和多元視角。最終，我們看到，歷經經濟沉浮與觀光衝擊後，真正賦予水金九靈魂的，是人們對土地的情感與記憶。這強化了對「地方認同既是經濟地理基礎又是情感基礎」這一命題的理解，並擴展了人地關係中「情感連結＋行動參與」重要性的理論涵義。

綜上，本研究完整回應了研究問題，並將實證發現與既有理論加以對應與延伸：從居民口述中抽繹出的要素如情感連結、集體記憶與參與投入，不僅契合了地方認同理論中的核心概念，也豐富了文獻中對於經濟條件與人地關係影響的論述。透過跨階段的分析，研究展示了地方認同的時空動態特質，強調理論應兼顧歷史深度與空間結構這兩大維度，並呼應了在地質公園文獻中所提倡的「文化與自然共生、社區參與」重要性。



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在執行過程中仍存在若干限制，有必要在解讀結果時予以說明。首先，在訪談樣本方面，受限於時間和人力，僅選取了水金九地區十一位具代表性的居民進行訪談。這些受訪者多為社區中對地質公園或地方事務較熱心者，其觀點能深入反映地方認同的形成機制，但也可能高估了積極參與者的比例，未必完全代表所有一般居民的看法。換言之，樣本存在選擇偏差的可能，研究結論的適用性需謹慎推論至整體社區。其次，研究場域範圍侷限於水金九地區，屬北部山城小聚落的特殊案例。本研究所獲致的結論與洞見，主要反映此區獨特的歷史文化脈絡與社會經驗，未必適用於其它性質不同的地區。在缺乏跨區域比較的情況下，本研究結果的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有限，需要透過後續在類似歷史聚落的研究進一步驗證。

研究時程與資源有限亦對結果造成影響。本研究於 2025 年間進行訪談，此期間水金九地區的地質公園推動尚處於草創醞釀階段，研究所蒐集的資料反映的是地質公園尚未正式成立前居民的觀感與態度。如果在地質公園正式掛牌營運若干年後再行調查，居民的環境素養與地方認同可能隨經驗累積而改變，屆時所得結果可能有所不同。本研究屬單一時點的橫斷面研究，無法掌握此種隨時間推移的動態變化。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以質性深度訪談為主，難免帶有研究者主觀詮釋的成分。雖然本研究透過逐字稿編碼與多位受訪者觀點交叉比對，力求忠實呈現資料，但研究者在提問引導、內容翻譯（部分訪談涵蓋本土語言）以及分析詮釋時，仍可能受到自身知識背景的影響。這種主觀性是質性研究的內在限制之一。為降低偏誤，本研究已盡可能使用參與觀察、二手資料輔助等方式進行三角檢證，但仍不排除因研究者觀點限制而遺漏某些面向的可能。

第三節 後續研究建議

本研究於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幾個值得後續研究的主要議題，分述如下：

（一）擴大案例範圍進行比較研究

建議將研究觸角延伸至其他類似歷史背景的聚落，以檢驗本研究結論的適用性與發現新的變異因素。水金九地區屬於典型的礦業轉型觀光社區，未來可選取臺灣其他曾經歷產業興衰的地區（例如平溪煤礦聚落、南部煤礦村或其他曾以單一產業為命脈的小鎮）進行比較研究。透過跨案例的對比分析，可評估不同地域文化下地方認同的共通模式與差異點。

（二）結合量化方法深化驗證

由於本研究以質性訪談為主，後續研究可考慮引入量化研究以補強論證。建議針對水金九在地居民進行大樣本的問卷調查或量表測量，量化評估居民的環境素養水準、地方依附感強度以及對地質公園的態度等。透過統計分析，可更精確地呈現各變項間的相關性與影響力，驗證質性研究所得出的關係假設。

（三）深入探討不同世代的認同變遷與傳承

針對本研究揭示的代際斷層問題，建議後續研究專門聚焦於不同世代對地方認同的變化歷程與傳承機制。一方面，可對水金九地區的老中青三代居民分組進行訪談或問卷，比較他們記憶中的家鄉形象、價值觀與認同感來源。

（四）分析政策介入與文化資源利用對地方凝聚力的影響

由於地方認同感往往受到外在政策與資源投入的形塑，建議後續研究評估不同類型政策或文化資源介入對社區凝聚力與認同的影響效果。此外，可探索文化資源活化利用對社區認同的影響，透過案例評估與經驗總結，後續研究可提出具體建議供政府及社區領導參考，以在政策設計上更充分考慮在地認同與凝聚力的培育。

參考文獻

1. 王文誠. (2015). 從國家公園到地質公園：一個社區參與的保育制度 (一). 地景保育通訊(41).
2. 王文誠. (2016). 從國家公園到地質公園：一個社區參與的保育制度 (二). 地景保育通訊(42), 2-11.
3. 王文誠. (2018). 偏遠的驕傲：加拿大地質公園發展進程與借鏡. 地景保育通訊(46), 2-10.
4. 王文誠. (2021a). 雲林縣古坑鄉草嶺地質公園發展構想與規劃. 地景保育通訊(53), 2-8.
5. 王文誠. (2021b). 學習性地景：地質公園在教育上的意義 [Learning Landscape: Geoparks'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 地景保育通訊(52), 2-10. [https://doi.org/10.6577/ln.202106_\(52\).0001](https://doi.org/10.6577/ln.202106_(52).0001)
6. 王文誠. (2022). 讀景. 地景保育通訊(54), 29-36.
7. 王智明. (2023). 回到歷史生發的時刻-編輯室報告. 文化研究(36), 4-5.
8. 王萬睿. (2015). 複攝山城：侯孝賢與吳念真之地景美學. 流離與歸屬：二戰後港臺文學與其他, 1, 357.
9. 王鈴琪, 李光中, & 伍玉成. (2021). 鯉溪地質公園學習性地景之實踐歷程. 地景保育通訊(53), 9-12.
10. 伍家稚. (2023). 烈嶼地質公園發展環境教育設施場所之永續發展評估
11. 朱竑, 錢俊希, & 呂旭萍. (2012). 城市空間變遷背景下的地方感知與身份認同研究. 地理科學, 32(1), 18-24.
12. 朱竑, 錢俊希, & 陳曉亮. (2010). 地方與認同：歐美人文地理學對地方的再認識. 人文地理, 25(6), 1-6.
13. 何昕家. (2021). 初探地方本位教育，地方創生與地方感關係. 通識教育與跨域研究.
14. 余明仁, & 張訓. (2018). 從異鄉到新鄉：外地人的地方認同之研究. 育達科大學報,(46), 55-72.
15. 吳亞璇, 梁家寧, 蔡靜, 黃品瑜, & 蔡佳穎. (2015). 九份的旅遊導覽手冊.
16. 宋郁玲. (2022). 南國夢：馬來西亞吉隆坡之台灣人才的空間流動與資本積累. 台灣東南亞學刊, 17(2), 49-91.
17. 張京祥, 胡毅, & 孫東琪. (2014). 空間生產視角下的城中村物質空間與社會變遷——南京市江東村的實證研究. 人文地理, 29(2), 1-6.
18. 李光中, 陳勤忠, 劉鎮輝, 林曉薇, 高筱婷, & 周德清. (2020). 臺灣煤礦產業遺產之系統性文化景觀研究.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 57, 49-70.
19. 林宗賢, & 李安娜. (2011). 初次與重遊襲產遊客旅遊區意象, 知覺品質與重遊行為意圖關係比較-以金瓜石九份地區為例. 休閒產業管理學

- 刊, 4(1), 1-20.
20. 林俊全. (2022). 回顧地質公園學會六年的工作. 地景保育通訊(55), 2-5.
 21. 施照輝. (2022). 美國的地景保育. 地景保育通訊(55), 33-39.
 22. 段義孚, 志丞, & 劉蘇. (2018). 戀地情結. 北京: 商務印書館.
 23. 洪世謙. (2022). 勞動, 戲劇, 書寫:[前鎮草衙] 再造地方認同的實作. 文化研究(34), 188-210.
 24. 洪迺鈞, 張晏慈, 楊義彬, 李彥樺, & 陳峻強. (2015). 台灣地景民宿之發展以九份空間好客民宿經營為例. 休閒運動管理學刊 (1), 52-61.
 25. 胡榮. (2003). 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 社会学研究, 5, 58-69.
 26. 張芬芬. (2021). 質性研究法進階探索: 換一副透鏡看世界.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7. 張家銘, & 施富盛. (2013). 世界遺產的想像與建構-九份, 金瓜石與班鎮 (Banska Stiavnica) 的個案比較.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 25-57.
 28. 張雅媚. (2023). 山中村社區發展與地方感之研究. 文化事業與管理研究, 23(2), 47-63.
 29. 許正賢. (2022). COVID-19 疫情下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行動者網絡策略轉型研究. Journal of Museum & Culture, 24, 5-39.
 30. 陳柏廷. (2016). 野柳地質公園經營管理成效評估
 31. 曾慈慧, 沈進成, & 陳麗如. (2011). 礦業遺產觀光中真實性對觀光意象, 地方感與遊後行為意圖之影響. 戶外遊憩研究, 24(3), 79-111.
 32. 黃家俊, & 紀權甯. (2021). 從地質觀點出發的地質多樣性評估—以九份金瓜石水湳洞地質公園為例. 地景保育通訊(53), 13-18.
 33. 黃瑞琴. (2021). 質性教育研究方法. 心理.
 34. 楊佳瑋. (2015). 臺灣礦產業文化資產保存策略研擬-以水金九地區為例.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建築及都市設計碩博士班學位論文, 1-128.
 35. 萬文隆. (2004). 深度訪談在質性研究中的應用. In: 生活科技教育月刊.
 36. 劉靜怡. (2022). 以協作治理觀點檢視地方創生: 水金九地區地質環境資源之例.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學位論文, 2022, 1-96.
 37. 潘淑滿. (2022). 質性研究: 理論與應用. 心理.
 38. 潘慧玲. (2003). 社會科學研究典範的流變. In: 教育研究資訊.
 39. 蔡宗雄. (2012). 從礦業遺產到生態博物園區-新北市立黃金博物館與金瓜石聚落保存的發展經驗. 文化資產保存學刊(22), 113-122.
 40. 蔡倩雯. 休閒農場遊客不當遊憩行為動機與行為之永續管理策略之研究.
 41. 鄭得興, 蘇冠華, & 陳書豪. (2013). 觀光發展與在地記憶的疏離-以九份, 金瓜石為例. 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學報, 107-147.
 42. 閻亞寧. (2014). 100 年度世界遺產文資整備平台委託案-金九礦業聚落.
 43. Azman, N., Halim, S. A., Liu, O. P., Saidin, S., & Komoo, I. (2010). Public

- education in heritage conservation for geopark community.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7, 504-511.
44. Belanche, D., Casaló, L. V., & Rubio, M. Á. (2021). Local place identity: A comparison between residents of rural and urban communities.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82, 242-252.
 45. Bird, S. E. (2002). It makes sense to us: Cultural identity in local legends of pla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1(5), 519-547.
 46. Bonaiuto, M., Carrus, G., Martorella, H., & Bonnes, M. (2002). Local identity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s in land use changes: The case of natural protected areas.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23(5), 631-653.
 47. Brilha, J. (2018). Geoheritage and geoparks. In *Geoheritage* (pp. 323-335). Elsevier.
 48. Brilha, J., Gray, M., Pereira, D., & Pereira, P. (2018). Geodiversity: An integrative review as a contribution to the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the whole of nature. *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 86. <https://doi.org/10.1016/j.envsci.2018.05.001>
 49. Chau, M. L. (2021). *Where Feelings Lie: The Urban Renewal and the Placelessness in Novels by Lee Wai-yi, Ho Lok and Cheung Yuen-man* = 情感何所依—李維怡, 可洛, 張婉雯小說中的市區重建與無地方性.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 40, 131.
 50. Chen, L.-J. (2022). 鼓動下的寧靜與回響.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51. Cuba, L., & Hummon, D. M. (1993). A place to call home: Identification with dwelling, community, and region.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1), 111-131.
 52. Farsani, N. T., Coelho, C. O., Costa, C. M., & Amrikazemi, A. (2014). Geo-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geoconservation via geoparks and geotourism. *Geoheritage*, 6, 185-192.
 53. Fauzi, N. S. M., & Misni, A. (2016). Geoheritage Conservation: Indicators affecting the condi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Geopark—a conceptual review.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22, 676-684.
 54. Frey, M.-L., Schäfer, K., Büchel, G., & Patzak, M. (2006). Geoparks—a regional, European and global policy. In *Geotourism* (pp. 95-117). Routledge.
 55. Harvey, D. (2006).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 Verso.
 56. Harvey, D. (2018). *The limits to capital*. Verso books.
 57. Henriques, M. H., & Brilha, J. (2017). UNESCO Global Geoparks: A

- strategy towards global understanding and sustainability. *Episod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Geoscience*, 40(4), 349-355.
58. Lewicka, M. (2011). Place attachment: How far have we come in the last 40 year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31(3), 207-230.
<https://doi.org/https://doi.org/10.1016/j.jenvp.2010.10.001>
 59. Liu, C.-Y. (2022). 以協作治理觀點檢視地方創生：水金九地區地質環境資源之例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60. Martini, G., & Zouros, N. (2009). Geoparks... a vision for the future. *Revista do Instituto de Geociências-USP*, 5, 85-90.
 61. McKeever, P. J., Zouros, N. C., & Patzak, M. (2010). The UNESCO global network of national geoparks. *The George Wright Forum*,
 62. Network, G. G. (2015). *Global Geoparks Network*. In: Disponível.
 63. Paasi, A. (2003). Region and place: regional identity in ques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7(4), 475-485.
 64. Patzak, M., & Eder, W. (1998). " UNESCO GEOPARK". A new programme-a new UNESCO label. *Geologica Balcanica*, 28, 33-36.
 65. Proshansky, H. M. (1978). The City and Self-Identit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0(2), 147-169.
 66. Raagmaa, G. (2002). Regional identity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1.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10(1), 55-76.
 67. Relph, E. (1976).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Vol. 67). Pion London.
 68. Relph, E. (1997). Sense of place. *Ten geographic idea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205-226.
 69. Tuan, Y.-F. (1977).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U of Minnesota Press.
 70. Twigger-Ross, C. L., & Uzzell, D. L. (1996). Place and identity processe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6(3), 205-220.
 71. Yi, J., Du, Y., Liang, F., Zhou, C., Wu, D., & Mo, Y. (2014). A representation framework for studying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dynamic geographic phenome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 28(5), 1010-1027.